



民强国盛

# 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

## 各国传播方式及对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启示



# 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

各国传播方式及对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启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2017

免责声明：本研究报告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不一定反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其执行委员会或成员国的观点。本报告中使用的名称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的看法。本报告提出的建议仅代表研究人员的观点，并不反映任何政府或其他组织的看法。

版权所有。在注明出处的情况下，均可引用、复制或翻译本出版物中的任何部分。未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 鸣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感谢 Merriden Varrall 博士、徐秀丽博士以及梁梦柯女士撰写本报告，并感谢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对此项研究的支持。报告还得到韩玥女士、Niels Knudsen 先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其他官员在项目管理、报告内容和质量保证上的支持。同时也感谢所有为本报告接受访问和提供建议的专家和官员。本报告原文为英文，中文版由王超先生，陈彦丰女士和李坤夏女士翻译。希望本报告能够加深读者对当前国际发展合作在国内传播现状和机遇方面的认识，并激发进一步探讨。

# 目录

<b>执行摘要</b> .....	1
<b>引言</b> .....	3
研究背景.....	3
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共同挑战.....	3
研究方法和局限性.....	4
现有文献中关于“传播”、“公众认识”和“公众支持”之间的联系.....	5
<b>中国</b> .....	7
发展合作概况.....	7
传播背景.....	7
传播实践.....	8
<b>巴西</b> .....	12
发展合作概况.....	12
传播背景.....	13
传播实践.....	13
<b>印度</b> .....	15
发展合作概况.....	15
传播背景.....	16
传播实践.....	16
<b>荷兰</b> .....	18
发展合作概况.....	18
传播背景.....	19
传播实践.....	19
<b>南非</b> .....	22
发展合作概况.....	22
传播背景.....	22
传播实践.....	23
<b>韩国</b> .....	25
发展合作概况.....	25
传播背景.....	25
传播实践.....	27
<b>土耳其</b> .....	29
发展合作概况.....	29
传播背景.....	30
传播实践.....	30
<b>英国</b> .....	32
发展合作概况.....	32
传播背景.....	33
传播实践.....	33
<b>结语和五点建议</b> .....	36
第一点 明确目标.....	37
第二点 了解受众.....	37
第三点 培养民众的国际精神.....	38
第四点 有针对性地传播.....	39
第五点 审查和修改.....	39
<b>参考文献</b> .....	40
<b>附录一 2015-2017 年中国做出的主要发展合作承诺</b> .....	44

# 执行摘要

本报告对中国、巴西、印度、荷兰、南非、韩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的发展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并明确其对于中国的启示。本报告考察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如何向其国内公众传播国际发展合作，并探讨其多种传播方式形成的背景和原因。本研究旨在为同行间相互学习提供信息，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希望更深入开展国际发展国内传播的国家提供切实的建议。本研究的信息于2016年5月至8月期间通过案头研究、访谈和书面信函整理而来。

本研究发现，在各国选择将发展合作传播给国内公众的方式和原因上有一些共同主题。每个国家都根据本国国情，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这些主题。一些传统发展伙伴国的政府认为，大多数公民认为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穷人有先存的道德义务。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公民只是希望了解他们的税收去向何处。南南合作提供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南南合作提供方普遍担心的是，自己国家的公众会认为，在自己国家仍然面临许多发展挑战时而花钱去帮助别国是不明智的。这些问题也确实在发达国家出现过，但并未构成其不进行发展合作传播的理由。

本研究对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进行比较，有以下几点发现：

- ▶ 第一，传统发展伙伴国的公众对其他国家贫困问题和其本国政府发展合作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对南南合作提供方来说，尽管公众对贫困问题并不陌生，但对政府发展合作项目的认识普遍有限。另外，在本研究所涉及的许多国家中，公众往往会高估其政府的发展合作预算（如韩国、土耳其、荷兰和英国）。
- ▶ 第二，不同国家的公众支持对外援助的原因不同。在南南合作提供方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保持团结，提升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互惠互利（特别是经济利益）。这都符合南南合作的一些共同原则。对于本研究中的传统发展伙伴来说，道德义务往往是提供援助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是出于自我利益。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国的公众都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合作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国内的发展挑战和发展合作有效性的问题（如巴西、南非和英国）。
- ▶ 第三，本研究中的所有传统发展伙伴国都具有较为完善的国内传播策略、体制结构和传播工具，并有相关研究成果来支持发展合作传播政策的制定。相比之下，本研究中的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尚无相应基础设施来制定传播政策。
- ▶ 第四，传统发展伙伴的发展传播策略在不同程度上通常包含两个要素：第一，发展教育，即通过发展教育为发展支出搭建宏观背景、提供理由；第二，发展报告，即通过发展报告对支出做出说明。本研究中的大多数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都将传播重点放在发展报告上。

- 第五，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的传播情况存在一些共同问题（如巴西、印度和南非），包括：公众需求水平低；政府对国内公众批评敏感；以及数据一致性和技术能力等问题。这些国家也普遍认为，发展合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不易公开讨论或审议。

本研究从各国的考察结果中得出的关键信息是，**要实现有效的发展合作对内传播，传播方式必须符合各国不同的情况。**与国内受众产生共鸣，并提高公众支持度是南南合作提供方进行发展合作传播的重要目标。本研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南合作提供方制定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策略提出五点建议：

- **第一，明确目标。**明确发展合作传播的目标至关重要，这些目标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诸如中国等南南合作提供方同时面临诸多国内挑战，因此，重点是要考虑到国内发展的挑战，并把国际社会的期望与国内公众的需求相结合。
- **第二，了解受众。**传播者应对公众的看法、态度及其成因有一个深入的认识。然而，尽管公众态度非常重要，关于公众态度是如何形成的相关研究却少之甚少。中国可以考虑定期开展有关发展合作的民意调查，这有助于管控与传播相关的各种风险。
- **第三，培养民众的国际精神。**要使公众形成对政府发展合作的积极态度，首要条件是对他人有超越国界的联结感、义务感和责任感。因此，除了对政策和项目进行报告外，发展教育可能有助于使公众更广泛地理解政府提供发展合作的理由。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选择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关宣传活动，来向公众分享中国是如何支持其他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另外，中国可以探索如何讲述海外志愿者的故事。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可以通过开设适当的学校课程来加强发展教育工作。
- **第四，有针对性传播。**要根据目标受众决定相应的传播内容、传递方式和机构设置。同时要制定明确的计划，用于确定需要什么类型的资源来最有效地获得受众群并且实现传播目标。建议中国的传播工作需注意专业性和沟通性两个方面，在此指导框架下，注重强调发展合作的“道义性”、“有效性”、“合规性”、“相关性”和“外交性”五个特征，并针对不同受众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
- **第五，审查和修改。**根据一定的成功标准定期评估传播策略的有效性，并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就中国而言，重点是要尝试不同的传播方式，并使用基于证据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政策的调整和新举措的试行，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好随时适应和改变的准备。

关于南南合作提供方是如何将发展合作传播给国内受众的现有研究很少，而且本报告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可获得的信息量参差不齐。因此，本报告并不声称其研究结果是确凿的，而是为同行间相互学习提供一个介绍性的概述，并为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奠定基础。

# 引言

## 研究背景

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了重要的南南合作提供方。<sup>1</sup> 他们的发展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仍面临着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等长期的国内发展挑战。因此，南南合作提供方往往难以将本国发展合作的意图、成果和益处传达给国内公众。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在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投入上有较为久远的传统，但这类实践在南南合作提供方中却较为少见。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作为国际发展伙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做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坚定承诺。中国媒体和大众对中国发展合作的探讨日益增加，特别是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联合国峰会、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第 21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和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高级别场合上中国积极发表声明。<sup>2</sup> 这些探讨说明，在中国发展合作的动机、规模、分布和影响等问题上加强公众参与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尤其突出的问题是，精准扶贫、解决国内贫困问题，是中国明确指出在 2020 年前需要完成的国家优先事项。公众对国内仍未完全解决的贫困问题尤为关注，此时如何增强他们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支持和参与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个议题上，相关研究有限，但中国和其他国家更加有效地开展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空间越来越大。本研究就传统发展伙伴和南南合作提供方的传播经验进行梳理，试图对其开展发展合作传播的方式进行探讨，以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考察并比较中国和其他面临着类似中等收入国家挑战的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国情和传播方式。本研究还考察数个传统发展伙伴的经验，为南南合作提供方提供有用的借鉴。最终，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可能对那些希望加强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国家有所帮助。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够对中国政府当前或今后加强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举措起到帮助作用。

## 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共同挑战

许多南南合作提供方为遵循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原则，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报告国际发展领域相关支出。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即考虑到公众对本国国内发展的关切，政府如何在对支出情况进行报告的同时不致在民众中引起恐慌呢？<sup>3</sup> 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公众对贫困和发展问题了解甚少，但对于政府的对外发展支出

1. 注意术语：不同的国家更倾向于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国际发展合作。本报告使用“传统发展伙伴”一词来描述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而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或新兴发展伙伴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则称为“南南合作提供方”。所有发展提供方做出的工作都称为“发展合作”。

2. 有关中国 2015 至 2017 年所做发展合作承诺的详细清单，见附录一。

3. 这在较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



却高度关注。通常情况是，公众在原则上可能会支持减贫，但不会将其当做是自己的责任。这些情况并非是南南合作提供方独有的，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这种情况。<sup>4</sup> 为了应对这个困境，有些国家用非常专业的术语对支出情况进行报告，国内公众可能对此毫无兴趣（例如南非）；有些国家提供总体的信息，但不提供分类数据（如中国）；其他一些国家则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进行报告，让公民能够找到所需的信息，同时也着重开展发展教育工作，<sup>5</sup> 让公民感受到提供发展合作是合理的（比如韩国和荷兰）。总而言之，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与各类受众展开互动的过程中寻找平衡。因此，通过回顾不同国家的情况和做法，我们能够汲取相关经验。

## 研究方法和局限性

本研究考察了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土耳其在内的几个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对内传播方式，这些方式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采取这些方式。选择这些国家是出于多种理由，包括其地域多样性；与中国一样是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从发展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上而言他们是主要的南南合作提供方。报告同时也探讨一些传统发展伙伴的做法。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传播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所以是很好的比较对象。韩国近年来从发展援助受援国的角色转变为援助国，并从传统发展伙伴的传播策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也是一个有用的案例。同时，韩国与中国也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本报告是以国家为章节划分的。每个国家案例简要地概述了该国的发展合作基本情况，然后描述了制定和实施发展传播政策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每个案例的主要部分概述了该国当前正在实施的传播方式，包括现有数据、相关体制安排，以及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等。

本研究中关于南南合作提供方的信息主要基于相关学者、非政府组织人员、智库专家和当地民众的观点，以及在情况允许下对相关政府官员的采访。报告中的信息由作者于2016年5月至8月期间通过案头研究、面对面访谈、Skype、电话、以及书面信函整理而来。本研究也考察了某些英文媒体资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对其他语种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官方网站和公开声明等信息进行了考察。

由于研究资源有限，并且各国采取的传播方式不同，各国现有的信息量和信息种类也各不相同。本文中的引用应该被看作具有说明意义，而非具有代表意义。本研究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可比较的信息。本研究并不声称其研究结果是确凿的，而是将研究结果以一个介绍性的概况呈现，为今后开展更广泛、更严格的研究打下基础。

4. 例如英国，Henson等2010年在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发表了名为“英国公众对国际发展援助支持的看法定性调查结果(Public 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for Aid in the UK: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Enquiry)”的报告。

5. 关于“发展教育”的定义有很多，为了与本文提出的发展报告区分开来，作者借鉴了欧洲全球教育网的“全球教育”的定义：“打开人们的视野和心胸，关注世界现实，唤醒人们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赋公正、公平和人权的世界。”

见 <http://gene.eu/about-gene/global-education/>。

## 现有文献中关于“传播”、“公众认识”和“公众支持”之间的联系

关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发展传播和公众态度方面的文献是存在的，但关于南南合作提供方的相关文献则很少。<sup>6</sup> 因此，现有文献存在几个共同的假设。

首先，许多文献都假设“有效的传播”将提高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程度，从而使发展合作更加有效，并且还假设“良好”的发展传播与公众的认知水平和公众对本国发展合作的支持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例如，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表的许多报告认为，“公众的参与可以建立支持，使发展政策更有效”，这些报告还提供了相关经验教训和政策建议（OECD, 2014年）。联合国建议，发展伙伴应将发展合作预算总额的3%用于开展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中，以加强公众支持，并最终提高发展合作的有效性。但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关支出远达不到这一标准（North-South Centre, 2003年）。

事实上，关于传播、公众认识、对发展合作的支持、以及发展合作有效性之间关系的研究甚少（Henson等，2013年）。荷兰和英国等传统发展伙伴国的经验表明，这几者之间的关联非常复杂。传播工作是否会提高公众认识是值得讨论的，加强传播工作或提高公众认识是否会得到更多的公众支持，这同样值得怀疑。因此，公众对于贫困问题的抽象关注与对本国发展合作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有关系，这个并不明确（Henson等，2013年）。

就英国来说，尽管自1997年以来英国在发展传播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开展的公众态度追踪调查多年结果一致显示，大约一半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对国际发展挑战或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了解甚少（Henson等，2010年）。同样地，一些研究表明，在支持发展合作程度较高的国家，公众对发展合作的了解程度往往是有限的（Riddell, 2007年），高水平的公众认识并没有促成高水平的公众支持。例如，在韩国，公众在这方面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但对减贫的支持程度却普遍较高，对政府发展合作项目的支持程度为中等（Kwon等，2012年）。在荷兰，几十年来对发展领域公众认识的投入并没有为荷兰发展合作政策带来更强有力的公众支持。

这个挑战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对公众为什么持某些观点缺乏理解，以及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去影响这些观点。也就是说，不知道什么可以让传播工作更加“有效”。许多国家通过问卷调查来追踪舆论走向，然而，这些问卷调查和民调的信息并不足以充分表明民众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是如何形成的。<sup>7</sup> 如果传播会提高公众理解或支持的这个假设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这将对各国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的理由和方式都有影响。

第二，有关发展传播的文献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文献假设了某些政治现实，并笃定传播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假设传播与公众支持有因果关系）公众支持被看作是政府有效开展发展合作的必要条件。这些文献的基本信念是，政府应该得到公众的支持，以便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中的一个、两个或全部：第一，批判国际发展政策，提高其有效性；第二，

6. 例如，除了 Czaplinska 2007 年的论文外，其主题是就如何为新欧盟成员国提供发展合作的支持提供有用的信息。

7. 例如，Henson 等（2010 年）讨论了调查的一些潜在缺陷，第 17 页。

确保政治支持率，以便相关预算可以被议会通过；第三，批准政府为实现外交或经济目标而预定的开支，并将其合理化（Henson 等，2013 年）。然而，关于公众对自己国家发展合作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有哪些，却鲜有分析。所以，上述一些支持国际发展传播的理由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情，各国需要理解为何以及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开展发展合作的传播工作。

现有文献中的第三个假设是，各国公众都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因此也会对“道德义务”，“作为全球公民的责任”，“正义”和“国家利益”等类似的关键词作出积极回应。还有一些假设认为大家对是什么导致贫困、什么是发展、应该如何实现发展、以及谁最应该去实现发展等问题持有共同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和观念取决于不同的态度和经历（Henson 等，2010 年）。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以往殖民主义受害国之间的团结感，或认为全球体系是不公正的共同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和义务感。这些国家的公民也许不太可能积极回应与“道德责任”类似的讯息，但这类讯息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而言可能很有号召力。在其他某些国家，公众可能不会对那些担负起帮助远方国家人民责任的呼吁产生共鸣。而包括韩国在内的某些国家对过去接受过的援助怀揣感激，因此呼吁“回馈”的信息对其民众很有号召力。如果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在特定的情况下随着文化规范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就需要适应这些细微的差异。

## 要点概括

- ▶ 现有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发展合作有一定的了解，表示支持的更为少数。这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中国对外援助在公众视野中仍然是个较新的议题，从供给上看，对此报道较少。第二，从需求上看，贫困问题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公众对于国内贫困问题的关注甚于对海外发展合作问题的关注。
- ▶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系统成型的发展合作传播策略。但近年来，政府开始关注发展合作的传播，例如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支持发展教育、制作相关电视节目等。与此同时，相关公共活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海外志愿者服务等提高认识的活动也逐渐兴起。
- ▶ 从宣传渠道上看，中国发展合作的相关报道由官方主流媒体主导。网络媒体和商业媒体自 2005 年以来也开始对该领域进行报道。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各个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实施发展合作项目，这为中国拓宽传播渠道提供了机遇。

## 发展合作概况

中国于 1950 年开始向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物资援助，并于 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后，将对外援助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愈加活跃，逐渐从受援国转变为发展合作提供方。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逐渐由政治意识形态驱动转向由经济实用主义驱动。中国对外援助自始至终坚持不干涉受援国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其他南南合作提供方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中国共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4000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约合 580 亿美元）（国务院新闻办，2016 年）。两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国务院新闻办，2011 和 2014 年），成套项目和物资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而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增长显著。亚洲和非洲是中国援助的主要地区。农业、教育、医疗服务、社会公共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是重点援助领域（国务院新闻办，2014 年）。中国对外援助由商务部援外司负责管理和协调，并根据项目的部门重点由不同的部委和司局负责落实。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发放和管理优惠贷款项目。

## 传播背景

在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原则下，中国的发展合作近年来有了很大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随着资金承诺和发展合作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信

息和数据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国际社会一直在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开展过程、规模和成果等议题上有长期的争论。

关于中国公众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态度，尽管没有政府组织开展的民意调查，但存在少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全球研究咨询机构 InterMedia 2012 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 46% 的城市人口表示对发展合作感兴趣，但当中只有 26% 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加强发展合作。该报告还指出，受访者可能将减贫、改善医疗和扩大教育机会等国内发展的成就等同为中国发展合作的成效（InterMedia，2012 年）。这些对发展合作的误解可能导致了调查结果出现偏差。Cheng 和 Smyth 2014 年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参与政治和宗教活动会提高他们对援外的支持，而贫困地区的民众则较少支持援外工作（Cheng and Smyth，2015 年）。Chan 和 Quek 在 2016 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 18.6% 的受访者支持中国增加援外投入。他们还发现，公众对援外的支持并不取决于援助数据是否公开，因为数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Chan and Quek，2016 年）。该研究还发现，78.8% 的受访者认为，提供援助带来的国家声誉和荣誉比受援国人民的福祉更为重要（Chan and Quek，2016 年）。更近期的研究是在 2016 年，李小云和徐进在全国范围内对具有多样人口统计特征的 3513 人进行了调查，发现 43.2% 的人表示知道中国的对外援助，并发现对援外的认知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调查还发现，18-29 岁的受访者中有 50.7% 知道中国的援外工作，而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知情比例则为 36.5%。总体而言，在表示了解中国援外工作的受访者中，有 81.5% 支持中国的援外工作，而且高收入的受访者往往比低收入者支持度要高（李小云和徐进，2016 年）。

简而言之，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发展合作有一定的了解，表示支持的则更少。这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缺乏公开报道，公众对这一领域没有太多概念；另一方面，贫困状况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公众普遍认为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是首要的，而对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减贫的支持力度不够。

## 传播实践

### *由官方媒体主导的发展合作报道*

目前，中国尚未有系统成型的发展合作传播策略。商务部相关部门负有对外援助工作传播的任务。就援外信息而言，商务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具体材料，由后者决定如何通过官方媒体进行传播。重要的发展合作信息包括国事访问声明、高层活动成果、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目前，国内媒体对中国发展合作的报道总是被归入贸易和投资等较大的经济合作议题内。报道的信息往往只是提供一般信息，而不是独立的故事或者援助项目的管理周期等。这方面的报道还更关注援助项目的历史和投入，而不是项目产生的实际影响。虽然这样的报道引人注目，但却很难确定其中有多少是由公众的兴趣所驱动的。

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官方媒体主导中国发展合作的报道工作。从 2005 年开始，网易、搜狐、凤凰卫视等网络媒体，以及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等商业媒体也开始对该领域进行报道。虽然规模有限，但商业媒体的报道往往被视为公共利益驱动，而非政府利益驱动。然而，了解援外项目的故事和影响需要深入的实地调研，在现有的人

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媒体预算体系下，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在接受作者访谈的媒体机构中，没有一家拥有报道中国对外援助的专职记者。<sup>8</sup>

中国正在谋求加强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各个国际组织作为发展合作项目执行伙伴参与发展合作项目落实的力度，例如，通过 2015 年中国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成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与国际社会和社会组织日益开放的合作态度，为中国拓宽传播渠道提供了机遇。

### *缺乏发展合作传播的原因*

中国缺乏相关信息共享可能是供需双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没有公布详细的项目信息，另一方面，公众对此关注度不够。

从需求方面看，如前所述，中国公众对发展合作的认识和支持水平相对较低。新浪微博上的搜索显示，相当多的关于中国对外合作的议题拥有较大的阅读量。“‘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两个议题的阅读量比“国际发展”和“对外援助”等议题要高很多。<sup>9</sup>这表明，目前公众对发展合作概念性议题的关注较少，而对具体议题和具体机构比较感兴趣。

从供给方面来看，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传播的时机。例如，2011 年在国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车事故，造成 19 名学龄前儿童死亡，中国旋即向马其顿捐赠校车的新闻报道就未得到中国公众的理解。<sup>10</sup>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就是报道不合时宜，因为当时公众更加关切国内校车质量，而不是马其顿的儿童。另一个问题是政治敏感性。例如，发布具体国别援助数据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导致受援国之间的竞争，他们可能会找中国说理。因此，中国政府不愿意公布详细的援助数据，但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愿意将公布援助数据的决定权交给受援国。<sup>11</sup>

### *政府主导的发展合作传播力度不断加强*

中国对发展合作的传播工作虽仍然有限，但过去几年来传播力度一直在加强。据介绍，中国对外合作日益频繁，对国内公众和海外受众开展发展合作传播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优先事项之一。<sup>12</sup>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已经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两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的历程、原则、资金规模、方式、分布以及管理方式。然而，白皮书的发布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公众讨论。此外，商务部于 2014 年发布《对外援助管理

8. 2016 年 6 月在北京与媒体人士的访谈。

9. 从第一次提及话题到 2016 年 6 月 22 日，“一带一路”的读量为 3418.6 万，其次为“亚投行”（602 万）；“南南合作”（51.1 万）；“国际发展”（32.2 万）；和“对外援助”（9.7 万）。

10. 马其顿校车网评论见 [http://bbs.tiexue.net/post2\\_5612377\\_1.html](http://bbs.tiexue.net/post2_5612377_1.html)，于 2016 年 8 月 14 日访问（匿名网友在线评论）。

11. 2016 年 6 月在北京与相关人士的访谈。

12. 2016 年 6 月在北京与相关人士的访谈。

办法（试行）》，<sup>13</sup> 作为中国在对外援助管理方面颁布的第一个综合性部门规章，对援外项目的立项、落实、管理和监测评估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在 2014 年 12 月生效之前，商务部在 4 月至 5 月期间在其网站公布了《办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生效后，商务部立即召开了媒体吹风会，对《办法》进行了解读，并回答了媒体的提问。<sup>14</sup> 国内外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倡议日益关注，使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公开更多信息的必要性。近年来，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联合国峰会、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 21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以及 2017 年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高级别场合，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种措施。据相关人士介绍，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合作的日益关注，中国有义务发布关于热门话题的相关信息。<sup>15</sup>

尽管中国公开发展合作数据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国领导层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2015 年 5 月，为纪念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习近平主席对外宣工作做出了重要批示：“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深受海外读者欢迎。2016 年 2 月，习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实地调研，再次强调提高对外传播能力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试行一些举措了。例如，中央电视台 2016 年春节期间播出的《中国人在非洲》<sup>16</sup> 纪录片系列，用 6 集节目讲述了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故事。凤凰卫视每周播出名为《龙行天下》<sup>17</sup> 的纪录片，讲述了在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传播产品迎合了国内以及国外的观众。

#### *利用发展教育和提高认识来弥补知识缺口*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早开设了发展教育项目。近年来，国际发展学位项目和培训项目出现在了更多的中国一流大学里。例如，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现开设了国际发展的硕士学位项目，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也设立在了北京大学。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教育项目往往是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不是针对中国本土学生。许多在国际发展领域工作的中国人则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这样看来，中国目前似乎是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分享知识放在首位。中国国内的科研人员自下而上倡导将国际发展学科纳入学校教学项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也致力为这些项目的设立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提高公众认识，除了通过正规教育项目外，大学教授和智库研究人员还经常被邀请去探讨关于援外的话题或者撰写相关文章。凤凰卫视等商业媒体也会邀请相关专家在电视节目上对国际问题发表评论。另外，中国农业大学的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于

13. 《办法》可在商务部网站查阅，网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412/20141200824824.shtml>。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将《办法》译成英文，可从以下网址查阅：<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foreign-aid-.html>。

14. 媒体吹风会详情请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412/20141200824824.shtml>（中文）。

15. 2016 年 6 月在北京与相关人士的访谈。

16. 《中国人在非洲》，见 <http://news.cntv.cn/2016/02/08/VIDEJ6RIL9MabxeEqmOUGNU9160208.shtm>。

17. 《龙行天下》，见 <http://v.ifeng.com/vlist/tv/ltx/2016/0/1/detail.shtml>。

2013 年开始运行，定期面向公众举办研讨会，支持研究人员开展国际发展研究工作。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联合国峰会上宣布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也于近期成立，将致力于研究发展问题，为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知识中心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向公众传播中国发展合作的工作上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不少相关的微博和微信平台也相继出现，帮助提高公众对国际发展问题的认识，并激发公众的讨论，如中国扶贫基金会、<sup>18</sup> 国际发展中心（南开大学）、<sup>19</sup> 布鲁金斯 - 清华公共政策中心、<sup>20</sup> 重阳金融研究所（人民大学）、<sup>21</sup> 社会科学研究所<sup>22</sup> 等微信公众号，以及国际发展时报（IDT）、<sup>23</sup> 发展观察、<sup>24</sup> InterDev 中国咨询<sup>25</sup> 等个人账号。

中国的海外志愿者服务在过去的十年里有了显著增长。援外志愿者服务作为中国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愈加受到政府和社会各届的关注和认可，政府和社会也推动了海外志愿者服务在中国的主流化。2014 年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向 60 多个国家派遣了近 7000 名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国务院新闻办，2014 年）。中国还计划加强在非洲的志愿者服务，作为其“中非民间友好行动”的一部分。“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sup>26</sup> 和“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sup>27</sup> 等多项海外志愿者计划已经成立。这些项目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而且提高了中国志愿者和公众对全球贫困和中国发展合作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在个人层面上产生共鸣。

中国政府认识到对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一个好迹象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机构在讲述中国援外故事上表现出高度重视的态度，并且建议商务部可以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提出相关政策方案。

18. 中国扶贫基金会，[http://weibo.com/cfpa?refer\\_flag=1005055013](http://weibo.com/cfpa?refer_flag=1005055013)，2016 年 9 月 19 日访问。

19. 微信账号：NKUCCID

20. 微信号：brookingsstinghua

21. 微信号：rdcy2013

22. 微信号：SRI\_ADRC

23. 微信号：idt2015

24. 微信号：SocObs

25. 微信号：InterDev\_Chinese

26. “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设立于 2002 年，由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实施，由商务部援外司监督。2002 年至 2013 年间，中国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22 个国家派出了 590 名志愿者。

27. “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设立于 2004 年，由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办管理。2004 年至 2013 年间，已向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 101 个国家派遣了 1.8 万名志愿语言教师。



# 巴西

## 要点概括

- ▶ 相关研究表明，巴西公众基本上不了解巴西的发展合作，但普遍表示赞成巴西帮助其他国家的穷人。
- ▶ 促使巴西公众对发展合作产生积极态度的因素包括：团结和道德义务等价值观；国家安全的考虑；拥有稳定外部环境的益处；以及为巴西争取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而经济利益目前不被巴西视为提供发展合作的主要动力。
- ▶ 目前，巴西政府极少向巴西公众传播发展合作，也没有对内传播的专门机构设置。发展合作在巴西被认为是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不易公开讨论。
- ▶ 巴西每隔几年发布一份《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报告》，提供巴西发展合作的相关数据。巴西合作署似乎是所有机构当中对技术合作开展传播最多的机构，其工作重点是在发展报告上。

## 发展合作概况

巴西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提供技术合作（Leite 等，2014 年）。如今，在巴西，有一百多个相关机构参与提供发展合作，其中最主要的是隶属于巴西外交部的巴西合作署（Brazilian Cooperation Agency<sup>28</sup>）。巴西合作署并不是一个监管所有巴西发展合作项目的总管理机构，而只是负责协调和资助技术合作项目。维和、教育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发展合作方式独立于巴西合作署运作。

巴西的发展合作与其外交政策一样，秉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念和“非漠视”原则，也就是说，面对寻求巴西帮助的民众，巴西不能漠视他们的痛苦（Almeida, 2013 年）。巴西致力于南南合作，因此不愿被认为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过于保持一致，<sup>29</sup> 巴西最近申请加入经合组织，<sup>30</sup> 这一举动可能会影响其发展合作政策。巴西也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创始成员之一。

28. 葡萄牙语：Agencia Brasileira de Cooperacao（ABC）。

29.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1）的访谈；另见 Kellee Usher（2011 年），“巴西：来自基层的援助”（‘Brazil: Aid from Below’），《国际事务评论》，第 20 卷，第 1 期：夏季，第 4 页；以及 2010 Cobradi 报告（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2010 年），2010 年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研究（Brazilian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0），第 14-25 页。

30. 路透社，“更新 1- 巴西寻求加入经合组织，尽管政治危机爆发”，2017 年 5 月 31 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brazil-oecd-idUSL1N1IW1X2>。

## 传播背景

相关研究表明，许多巴西人不了解巴西的发展合作，或者对巴西在发展合作方面的支出没有准确概念（Ipsos Public Affairs polling, 2015 年）。巴西政府在传播方面做的很少，而巴西商业媒体的相关报道往往把重点放在对海地的援助等人道主义干预上，而且往往对巴西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sup>31</sup> 比如说，媒体会质疑巴西支持什么样的国家政府，以及指责巴西把钱花在国外，而国内发展却依然挑战重重。<sup>32</sup> 尽管如此，许多巴西民众普遍对巴西参与国际发展持赞成态度。一项关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全国民调显示，92.5%“有兴趣且知情的公众”、以及 81.5%“无兴趣且不知情的公众”认为帮助其他国家的穷人是非常重要的。<sup>33</sup> 一项民调显示，2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将国家预算的 20%以上用于援外。<sup>34</sup> 巴西总体的氛围是积极的，对巴西发展合作的批评主要与据称巴西支持非民主或腐败的政权有关。<sup>35</sup> 然而，倡导团结和道德义务的价值观念似乎使巴西公众对发展合作仍持积极看法。此外，巴西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即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拥有稳定外部环境的益处。加强巴西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的作用被认为是巴西提供发展合作的主要外交目标之一（Leite 等，2014 年）。另一方面，经济利益目前不被巴西视为提供发展合作的主要动力。在传播言辞中最多是把发展合作给巴西带来的经济利益视为意想之外的结果（Leite 等，2014 年）。但是鉴于巴西当前的经济形势，这一情况可能会改变。<sup>36</sup> 现任政府发出了信号，要平衡工党政府的政治理想与未来南南合作中互惠互利、共享商业利益的理念。

## 传播实践

巴西各个发展合作机构之间就是否以及如何开展发展合作传播这个问题存在争议。<sup>37</sup> 巴西外交政策界认为，发展合作是巴西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对公开讨论持一定的抗拒态度。巴西公众似乎也没有由于信息公开和公开辩论可以提高巴西发展合作有效性而增加对巴西发展合作的关注。

目前，巴西没有面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的专门机构设置。发展合作方式多样、所涉及的机构众多，意味着各个组织需要各自负责向公众传播各自的发展合作。在所有相关机构中，巴西合作署似乎是针对技术合作开展传播工作最多的机构。传播以报告的形式为主，而不是通过加强发展教育或公众参与。巴西合作署设有便捷的网站，其所有项目的信息都会在此公布，包括支出的去向和原因，虽然不是所有信息都可以获得，或者是更新的。尽管巴西合作署拥有自己的网站和数据库，2013 年“国际援助透明化倡议”指数（Aid Transparency Index）排名显示，巴西在 72 个国家中的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49 位降到第 56 位。

31.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2）的访谈。

32. 2016 年 6 月，与巴西联系人的访谈。

33. IRI (n.d.) Brasil, as Américas e o Mundo: Opinião Pública E Política Externa, São Paulo: Instituto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USP.

34. 这些数字应该谨慎阅读 - 同一份报告发现，接受调查的巴西人中有 21% 认为政府已经将 30% 以上的预算用于援助，还有 13% 的人认为政府花费了 21% 以上。

35.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2）的访谈。

36.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2）的访谈。

37.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1）的访谈；Leite 等（2014 年）同上，第 57 页。

这一下降似乎是由于巴西缺乏项目投入的具体信息和项目评估（Leite 等，2014 年）。巴西合作署也使用社交媒体；它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有上千粉丝。<sup>38</sup> 另外，巴西已开始编写一份发展合作白皮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布任何一份说明其发展合作政策的文件。合作署计划在 2017 年为纪念其成立 30 周年而发表一份总结过去几十年工作的详细报告。<sup>39</sup> 巴西卫生部也值得一提，因为卫生部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国际医疗合作管理系统（UNDP China，2014 年）。但是，在对所有机构发展合作项目的监督评估方面反映了巴西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更广泛的挑战（Leite 等，2014 年）。

2010 年，由巴西政府应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sup>40</sup>）出版了首份《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报告》（Brazilian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up>41</sup>），提供了 2005 年至 2009 年巴西发展合作的相关数据。<sup>42</sup> 2010 年的报告首次汇总了各机构的项目数据。尽管在发展合作报告上，巴西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报告只提供了巴西发展合作总额，并没有提供更详细的分类数据。该报告还侧重于发展合作项目的产出（outputs），而不是结果（outcomes）或项目产生的影响（impact）。应用经济研究所在 2013 年发布了第二份《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报告》，涵盖了 2010 年的发展合作数据，其中囊括了更多机构的工作和更丰富的发展合作方式，但仍然没有提供巴西发展合作的完整情况（Leite 等，2014 年）。2016 年，研究所发布了第三份报告，涵盖了 2011 年至 2013 年的相关数据。<sup>43</sup>

尽管巴西提供的数据缺乏细节可能是由于获取可靠数据的难度，但也可能是个战略性的决策，因为发展合作被视为巴西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巴西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或不愿意将其外交政策置于公众审视之下。<sup>44</sup> 据称，新政府比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政府更关注包括南南关系和发展合作在内的外交政策，所以这种文化观念可能会转变。有专家认为新一届外交部部长的讲话倾向于更加务实地阐释发展合作政策，作为加强国内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打着政治团结的旗号。并且，巴西申请加入经合组织可能会对其发展合作政策以及国内传播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

38. 巴西合作署的 Facebook 主页：<https://www.facebook.com/ABCgovBr/>。

39.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1）的访谈。

40. 葡萄牙语：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mica Aplicada (IPEA)。

41. 葡萄牙语：Cooperação Brasileir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Internacional (Cobradi)。

42. 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mica Aplicada (IPEA) (2010) Orientações COBRADI. Cooperação Brasileir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Internacional (Cobradi): Primeiro Levantamento (2005-2009). Guia de Orientações Básicas. Brasília: IPEA.

43. 报告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ipea.gov.br/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8542&Itemid=406](http://www.ipea.gov.br/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8542&Itemid=406)。

44. 2016 年 6 月与巴西非政府组织人员（1）的访谈。

# 印度

## 要点概括

- ▶ 研究发现，大部分印度公众不知道印度在提供南南合作，但有些人会从媒体上了解到相关信息。关于印度作为发展伙伴的角色，目前在印度很少有公开的讨论。
- ▶ 研究发现，印度公众普遍认为提供发展合作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此外，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团结和商业互惠的呼吁也有助于加强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
- ▶ 印度政府目前没有采取积极的举措，更广泛地向公众传播本国的发展合作。印度媒体对发展合作的关注也仍然有限。
- ▶ 印度政府的对内传播工作可能受限于四方面因素：第一，能力制约；第二，谁负责传播以及传播什么内容等问题存在争议；第三，政府对国内批评敏感，缺乏传播的动力；第四，公众对这方面信息需求不足。
- ▶ 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通过出版知识产品和举办与印度南南合作相关的活动来提高公众的认识。印度发展合作论坛（Forum on 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也一直负责组织与基层利益相关者的地区性磋商会议。

## 发展合作概况

印度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提供发展合作，最初是向不丹和尼泊尔提供援助（Mawdsley, 2011 年）。印度的发展合作传统上是在“发展中国家间团结”和“不结盟”的语境下开展的（Mawdsley, 2014 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印度的发展合作转向以商业和地缘政治为导向（Mawdsley, 2014 年）。做为发展合作治理系统改革的中坚力量，印度明确表示，需要开创一种独特的发展中国家方式，采用一套全新的发展合作规则体系（Chaturvedi and Mulakala, 2016 年），一些人将其称为“新发展契约”（new development compact）（Chaturvedi, 2016 年）。自 1960 年代以来，印度的发展合作一直集中在其邻国，特别是阿富汗、尼泊尔和不丹，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传统上以技术合作为主，但债务减免、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和信贷额度等方式在近年有显著增加（Mawdsley, 2011 年）。

印度已经开始将众多发展合作机构集中化。印度外交部 2012 年成立了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dministration），该处从项目伊始到项目完成，对海外发展项目进行全程管理。<sup>45</sup>2013 年 1 月，印度发展合作论坛（Forum on 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成立，旨在联合包括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相关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在内的众多发展合作参与主体。论坛负责举办活动并对特定项目进行评估（Chaturvedi 等，2016

45. 详情见 <http://www.mea.gov.in/development-partnership-administration.htm>，于 2016 年 7 月 4 日访问。

年)。印度另一个特别的参与机构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是隶属印度外交部开展发展合作和国际经济问题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研究中心公开发布针对政府政策的重要分析报告，并承担发展合作议程设定的工作，鼓励并支持印度政府采取新政策。

## 传播背景

有些人认为大部分印度公众并不知道印度在提供南南合作。<sup>46</sup> 然而，许多人知道印度在为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愿意帮助尼泊尔、不丹和一些非洲国家 (Mawdsley, 2011 年)。其他关于公众认识的研究表明，经常阅读当地报纸和观看电视节目的印度民众对本国的发展合作活动至少有一些认识 (Mawdsley, 2014 年)。

外交政策一直是印度总理莫迪关注的重点。印度的外交强调印度是重要的国际参与者，负责任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之一。这种叙述方式与印度公众产生了很好的共鸣。<sup>47</sup> 公众认为，提供发展合作是国家自豪感的来源，这意味着印度公众与其他南南合作提供方相比，并不强烈认为国家应该优先考虑解决国内的发展挑战。此外，呼吁发展中国家间相互团结和商业互惠也有助于促进印度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 (Mawdsley, 2011 年)。虽然对印度发展合作的批评声音是存在的，但是印度社会最有声望和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很可能对国家主导的发展合作方案表示支持 (Mawdsley, 2014 年)。

印度公众对发展合作活动的支持因不同的收入群体、阶级群体或不同区域及民族语言特征而异 (Mawdsley, 2011 年)。某些研究显示，印度最富裕的 20% 的人口，包括从非常富裕到中等偏下的阶层，可能都会支持发展合作，理由是提供发展合作对印度的私营部门有利。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团结”和“正义”的语境与这个阶层作为印度公民，认为印度是全球政治中一个遵守原则的重要参与者的自我形象相呼应 (Mawdsley, 2011 年)。中间的 40% 人口也可能与最富裕的阶层出于同样的原因支持印度提供发展合作。最贫困的 40% 的人口由于能够从印度新兴大国的地位上获得自豪感，并且与其他国家的穷人产生团结感和共情，也可能会积极地看待印度的发展合作 (Mawdsley, 2011 年)。

## 传播实践

虽然印度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就发展合作议题进行的讨论日益增多，但政府目前并没有积极地向更广大的公众传播发展合作。关于印度作为发展合作伙伴的公众讨论很少 (Mawdsley, 2014 年)。

印度外交部设有一个媒体中心，推出了几款传媒产品，包括讨论印度与各国双边关系的电台节目等。但是，这些节目并不专门探讨发展合作。印度外交部还出版一些年度报告，

46. 2016 年 7 月与印度学者的访谈；在 2016 年 6 月对新德里一小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居民进行了访谈，他们完全不知道印度南南合作的存在。

47. 2016 年 7 月与印度学者的访谈。

简要介绍印度提供的信贷额度、无偿援助、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等主要发展合作方式。<sup>48</sup>

除了外交部的传播工作之外，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还通过出版知识产品以及举办与印度南南合作有关的活动来提高公众认识。例如，2016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关于南南合作的国际会议，有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参加了会议，增强了印度作为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国际地位。<sup>49</sup> 该会议在《今日印度》、《新印度快报》和《印度写作》等印度主要媒体上都有报道。印度外交部与研究中心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印度公众针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讨论。但据一些人士称，这种讨论目前仍局限在印度精英政策界。<sup>50</sup> 但也有人认为，印度发展合作论坛一直负责与地方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等基层利益相关方进行地区性磋商。<sup>51</sup> 印度支持这方面的公众论主要是出于对印度国际声誉的考虑，需要解决透明度和问责制等问题。<sup>52</sup>

《印度泰晤士报》等主流报刊偶尔会刊登有关印度对外关系的文章，其中如果提到发展合作，都将其定位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部分。<sup>53</sup> 通常以“慷慨”和“双赢”来形容，表达对印度具有“包括海洋、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政治、战略和经济方面”的众多益处。<sup>54</sup> 印度的发展合作只有在发生重大灾难、涉及相当大的数额或高层访问时才受到媒体关注（Mawdsley, 2014年）。即便被媒体报道，报道内容也往往是简短地陈述事实，并被归纳到其他报道中（Mawdsley, 2014年）。2012年《印度教徒报》的一篇文章称，印度媒体几乎完全没有报道关于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成立的消息（Chaturvedi, 2012年）。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政府的对内传播工作似乎被多方面因素所限。首先，能力限制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外交部和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对内传播工作。<sup>55</sup> 其次，由于印度外交部与财经部之间关系紧张，由哪个部门来负责传播工作、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信息等，这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印度政府发表一份发展合作白皮书的事情至今仍无定论，可能也与这种紧张的政府部门间关系有关。<sup>56</sup> 第三，印度政府对国内的批评很敏感。第四，由于目前印度公众似乎并没有获取更多发展合作信息的需求，政府也就没有提供更多信息的动力。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印度精英阶层认为，发展合作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存在着一种相对孤立的文化（Mawdsley, 2014年）。然而，尽管缺乏针对国内公众的信息分享，印度正加大力度向国际公众展现其国际合作成果（Mawdsley, 2014年）。

48. 2015-2016 年度报告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发展合作部分见第 171-176 页。

49. 2017 年 1 月与印度智库专家的书面信函。

50. 2016 年 7 月与印度学者的访谈。

51. 四次磋商会谈已经完成，还有几个在计划中。

52. 印度发展合作论坛区域协商会议的报告可从论坛官网找到：见印度发展合作论坛政策简报第 5 和第 6 期 <http://fidc.ris.org.in/?cat=3>，还可以从 <http://www.ris.org.in/fidc-regional-consultation-chennai-summary-proceedings> 看到 Chennai 报告。

53. 2016 年 7 月 22 日与印度学者的访谈。

54. 详情见：<http://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i-edit-page/with-his-visit-to-four-countries-pm-modi-steps-up-the-pace-of-indias-africa-engagement/>，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访问。

55. 2016 年 7 月 22 日与印度学者的访谈。

56. 2016 年 7 月 22 日与印度学者的访谈。

# 荷兰

## 要点概括

- ▶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荷兰公众支持荷兰的发展合作工作，但对全球贫困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认识较薄弱。
- ▶ 荷兰是少数从概念和结构上区分“发展教育”和“发展报告”的国家之一。
- ▶ 荷兰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负责开展广泛的提高认识的活动，包括运营一个名为 OneWorld 的多媒体平台和一个名为 SamSam 的教育平台。委员会还通过其研究分支 Kaleidos 开展研究工作，并举办公共活动。
- ▶ 全国委员会将其受众分为几个目标群体，并为每个群体制定了相应的传播策略。
- ▶ 作为选举周期的一部分，荷兰每四年开展一次关于国际发展的民众态度调查。荷兰政府一直在审查本国的发展传播方式，其新制定的传播策略将更加注重强调荷兰“为什么”提供发展合作以及“如何”提供发展合作，而不是关注“花费多少”。

## 发展合作概况

荷兰自 1949 年起就一直是援助国。<sup>57</sup> 在过去十年间，荷兰的发展政策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改革，其伙伴国的数量由 33 个下降到了 15 个，其中 10 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荷兰海外发展合作支出自 1975 年以来均达到或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 0.7%，但在 2013 年下降到了 0.67%，预计将进一步下降。<sup>58</sup> 荷兰政府支持加强发展合作与对外贸易政策的统一协调，并在外交部新设了一个内阁级的职位，负责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两大工作领域。<sup>59</sup> 荷兰外交部国际合作总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up>60</sup>）负责制定发展合作政策，以及负责协调、落实和提供资金支持。<sup>61</sup> 荷兰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p>62</sup>）是一家有独立的理事

57. 在 Spitz, Gabi, Roeland Muskens 和 Edith van Ewijk 编写的荷兰国家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报告（2013 年）中可以找到报告概述，对了解荷兰援助历史和发展很有帮助，“荷兰和发展合作：超前还是落后于人？”（The Dut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head of the crowd or trailing behind?）荷兰国家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阿姆斯特丹，网址：<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res/ada15ee2-be97-4d93-ac0f-0b114c27baab>，第 8-15 页。

58. 官方发展援助的占比估计在 2013 年已经下降到了国民总收入的 0.67%，导致荷兰自 1975 年以来第一次跌破官方发展援助占比 0.7% 的目标，在未来数年指示性预算显示占比将进一步减少，2014 年到国民总收入的 0.59%，2015 年和 2016 年为 0.6%。Donor Tracker: <http://donortracker.org/donor-profiles/netherlands>，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访问。

59. Donor Tracker，同上。在外交部内，外交部长负责对荷兰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部的全面领导。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部长协助外交部部长制定和执行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

60. 荷兰语：Directoraat-generaal Internationale Samenwerking（DGIS）。

61. 详情见：<https://www.government.nl/ministries/ministry-of-foreign-affairs/contents/organisational-structure/directorates-general>，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访问。

62. 荷兰语：Nationale Commissie voor internationale samenwerking en Duurzame Ontwikkeling（NCDO）。

会的非盈利基金，与几家大型非政府发展组织一起负责发展教育工作。<sup>63</sup> 荷兰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妇女权利；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与权利；水资源；粮食安全；以及安全与法治。<sup>64</sup>

## 传播背景

荷兰在历史上一直是小型的贸易国，因此荷兰人民与全球联系非常紧密，拥有相对外向型的世界观。作为选举周期的一部分，荷兰每四年开展一次有关国际发展的民众态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荷兰公众支持荷兰开展发展合作。例如，2012年，64%的受访者认为“帮助贫困国家发展”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Spitz等，2013年）。然而，荷兰公众对荷兰发展合作的预算支持率较低，但这个可能反映出公众普遍高估了政府发展合作预算的情况（Spitz等，2013年）。

一些研究表明，尽管荷兰公众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支持力度比较高，他们对全球贫困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认识却较为薄弱（North-South Centre，2005年）。这些研究还得出结论认为，荷兰过去在援助方面较高的透明度和公众讨论程度促进了荷兰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North-South Centre，2005年）。这表明，至少是在荷兰，尽管公众可获取全球发展问题的信息，而且与公众对援外的支持力度紧密相关，但了解全球发展问题复杂性的详细信息不是支持政府援外的必要条件。

荷兰公众对国际发展的支持和对增加或保持荷兰援助预算的支持在21世纪初达到峰值后一直下滑，峰值时期80%以上的公众都支持保持或提高官方发展援助水平（North-South Centre，2005年）。

## 传播实践

向公众传播发展合作的活动和政策一直是荷兰的传统，特别是通过发展教育和全球教育的形式。2005年《全球教育同行审评》报告（Global Education Peer Review）指出，荷兰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全球教育的支出上都处于最前沿（North-South Centre，2005年）。

荷兰政府于1971年成立了发展教育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Education<sup>65</sup>），响应联合国对援助国的号召，提高公众对官方发展援助的认识。1996年，该委员会作为欧洲首个支持、促进和资助发展教育的国家机构（North-South Centre，2003年），与环境教育平台合并，重组为荷兰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在21世纪初期，该委员会在欧洲的同类机构中属于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在全球教育领域被誉为“卓越中心”（North-South Centre，2003年）。

63. 在本节中，“发展教育”和“全球教育”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其依据是“2002年马斯垂克全球教育宣言”的措辞，将“全球教育”定义为“打开人们的视野和心胸，关注世界现实，唤醒人们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赋公正、公平和人权的世界。”这种教育“从理解上包括发展教育”。

64. Donor Tracker，同上。

65. 荷兰语：Nationale Commissie voor Ontwikkelingsstrategie（NCO）。



荷兰是少数几个从概念和结构上区分发展教育（或提高认识）和发展报告的国家之一。前者由全国委员会负责，由国际合作总署资助，在外交部领导下开展广泛的提高认识的活动。后者由外交部的新闻传播部门负责，主要侧重报道部门政策和部长的活动。但是，这种部门责任的区分并未反映在预算中：发展教育（或提高认识）和发展报告的相关预算是在一起的。

在荷兰，全国委员会肩负着大部分发展教育的责任。它开展几个关键活动，包括运营一个名为 OneWorld 的多媒体平台，旨在促进全球思维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拥有 12 万订阅者，及每月 14 万人次的网站访问量。<sup>66</sup> 委员会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SamSam 的教育平台，旨在提高公众对国际发展的认识。该平台办有杂志，以及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网站，拥有 55 万订阅者。<sup>67</sup> 委员会还通过其研究分支 Kaleidos 为两个平台和外部客户开展全球问题的研究。<sup>68</sup> 据称，荷兰政府为 SamSam 和 OneWorld 提供的资金正在缩减。<sup>69</sup> 此外，委员会还举办“为爱枕头战”（Pillow Fight for Love）等公益活动，旨在提高对全球性自由的认识，<sup>70</sup> 以及“吃这个”（Eat This）活动，促进公众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认识。<sup>71</sup>

全国委员会采取创新的方式，超越往常的目标群体，来吸引更多人群参与发展教育（North-South Centre, 2005 年）。它组织的媒体友好活动在提高发展合作问题的公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North-South Centre, 2005 年）。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全国委员会每年获得 900 万欧元的拨款用来倡导全球公民意识，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拨款还用于传播发展合作的成果。全国委员会的受众包括社会组织和公众，被分为几大类，例如，按年龄或学校类型划分的学龄儿童、年轻的专业人士、以及移民等，并为每类受众单独拟定传播策略。<sup>72</sup> 未来的传播策略可能会更多地去解析公众的观点，并对不同受众援助支持率下滑的现象展开详细分析。据荷兰官员介绍，相关研究结果将被用于制定一份具有高度针对性的传播策略。<sup>73</sup>

荷兰教育部在发展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学校在授课内容和方式上只要不超出总体课程大纲的范围，就可以自由设计课程。<sup>74</sup> 在中小学阶段，荷兰鼓励学校传授与发展教育相一致的价值观，地理和历史等学科的教学也强调全球视野。教师可以自行组织开展发展教育活动（North-South Centre, 2005 年）。

除了相关政府机构，由荷兰外交部资助的大型非政府发展机构也在全球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荷兰公众提供相关出版物和教育资源。这些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开发相关素材，用于学校教学（North-South Centre, 2005 年）。

66. 详情见：<http://www.oneworld.nl/>。

67. 详情见：<http://www.samsam.net/>。

68. 详情见：<http://kaleidosresearch.nl/>。

69. 2016 年 8 月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70. 详情见：<http://www.pillowfightforlove.nl/>。

71. 详情见：<https://www.eatthis.nu/>。

72.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73.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74. 详情见：<http://www.ncee.org/programs-affiliates/center-on-international-education-benchmarking/top-performing-countries/netherlands-overview/netherlands-system-and-school-organization/>，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访问。

荷兰政府的发展教育经费每年都作为政府预算的一部分对外公布。<sup>75</sup> 此外，全国委员会每四年发布一次关于发展教育和发展认识的政策文件。经过一个包括公共辩论在内的磋商过程之后，该文件会被提交给议会并被批准成为框架方案（Czaplinska, 2007 年）。过去十年来，荷兰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大幅减少。发展教育支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正受到重新审视。<sup>76</sup> 自 2014 年以来，由于所获拨款逐渐减少，全国委员会正在调整其定位，以及与外交部的关系，并开发新的商业模式。<sup>77</sup> 荷兰政府也在审议荷兰的发展传播策略。<sup>78</sup> 2012 年，外交部新闻司完成了一份 2012-2015 年传播策略，并定期进行更新。<sup>79</sup> 新闻司还负责监测传播策略的落实情况和结果，并在年度报告中进行说明。<sup>80</sup>

荷兰新的传播策略把为全球发展作出努力明确为一项公共责任。政府不仅被视为资助者，还负责一些具体的政策落实，如选择政策重点、促进政策落实、制定相关议程、以及践行外交。新的传播策略将更加强调荷兰“为什么”提供发展合作，以及“如何”提供发展合作，而不是关注“花费多少”，这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某些对官方发展援助质疑的声音。<sup>81</sup> 新策略将更注重如何通过发展合作解决国际合作和全球化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援助和贸易）、移民（解决根本问题），以及和平与稳定（为广泛的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sup>82</sup> 主要受众包括社会组织、商界、知识机构等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实的群体。<sup>83</sup>

75. 2012 年，荷兰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支出从国民总收入的 0.8% 下降到 0.7%。根据一个消息来源，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官方发展援助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从 0.82% 下降到 0.64%：<http://www.globalpartnership.org/about-us/donor/netherlands>，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访问。

76. 2016 年 8 月与荷兰政府官员的访谈。

77.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78.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79.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80.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81.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82.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83. 2016 年 7 月 15 与荷兰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 南非

## 要点概括

- ▶ 南非公众对本国的发展合作了解甚少。他们认为，解决南非国内的发展挑战比支持其他国家的发展更为紧迫。但南非参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通常会得到公众更为积极的反应。
- ▶ “乌班图（ubuntu）”在南非当地语言中代表人性善良的原则以及非洲人民之间的共享、凝聚力和团结感。部分人认为“乌班图”是支撑南非开展发展合作的理由。
- ▶ 南非没有设立集中负责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机构，国际发展问题也很少被媒体提及。但是为了保证信息透明，各机构的年度报告都提供了有关发展合作支出的相关信息。
- ▶ 南非政府缺乏对内传播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公众对发展合作信息的需求不足；第二，数据的供给比较分散，而且不一致；第三，政治精英阶层有着强烈的风险规避文化。
- ▶ 南非智库在分享有关南非海外发展援助的最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受众规模仍然有限。

## 发展合作概况

南非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提供发展援助，主要面向其他非洲国家，最初目的是为了赢得政治支持（Besharati，2013 年）。2001 年，南非外交部下新设的“非洲复兴和合作基金”（African Renaissance and Cooperation Fund）发表声明称，南非的发展合作将强调促进民主发展、人道主义援助、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善治。<sup>84</sup> 由于参与方众多、体制结构复杂，报告不一致，关于南非援外的精确数据很难明确（Law Library of Congress，2015 年）。但对数据的初步整合结果表明，南非无论是在绝对数值还是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都是非洲最大的发展伙伴之一。<sup>85</sup> 除了双边和三边援助之外，南非还是印度、巴西、南非基金（IBSA Fund）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员，也是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

## 传播背景

本研究表明，南非公众对本国的发展合作了解甚少。<sup>86</sup> 加强公众在这方面的认识是否会促进他们对发展合作的支持，这个无从知晓。某些问卷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南非公众

84. 详情见：<http://www.dfa.gov.za/foreign/Multilateral/profiles/arfund.htm>，于 2016 年 7 月 9 日。

85. 2016 年 6 月与南非智库专家（1）的访谈。

86.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非，该术语已经从“援助”转向“发展援助”，再转向“发展合作”（Besharati（2013 年）同上，第 35 页）。

认为国家应该提供援助。<sup>87</sup>一方面，尽管南非公众对发展合作有一定的认识和兴趣，但鉴于南非本国的情况，公众认为给他国，尤其是非民主政府掌权的国家提供发展支持是错误的。<sup>88</sup>南非在克服国内贫困问题上面临相当大的挑战（Yanacopolos, 2011年），考虑到这一点，在南非国内对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情况进行重新平衡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被视为一项迫切的工作。另一方面，参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特别是为了减少冲突，从而减少难民和移民流入南非，往往会得到公众更加积极的支持。“乌班图（ubuntu）”——在南非当地语言中代表人性善良的原则以及非洲人民之间的分享、凝聚力和团结感——被部分人认为是支撑南非开展发展合作的理由。更加实际的一个理由是南非公众对流入南非的贫困人口的关注，认为帮助邻国最终也能够对南非有帮助，这一点也能引起公众的共鸣。<sup>89</sup>

## 传播实践

南非政府没有设立集中负责发展合作在国内传播的机构，大多数参与发展合作的职能机构或其他组织也没有这样的机构设置。不过，由于对信息公开透明的广泛要求，在各个机构网站发布的年报上，都可以找到不尽相同但是大量的关于南非海外发展支出的信息。<sup>90</sup>

南非政府缺乏对内传播似乎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缺乏公众需求（公众的认识和兴趣水平较低）；第二，供给困难（发展合作数据的供给分散且不一致）；第三，政治精英阶层有着强烈的风险规避文化。尽管调查问卷显示，南非人口很可能会非常支持政府开展发展合作，但政客们仍然非常提防公众的反抗和异议。<sup>91</sup>总体上来说，南非的政治精英和政策精英阶层将发展合作看作是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外交的工具，他们担心南非公众可能会质疑政府为别国支出的合理性。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通过乌班图电台（Radio Ubuntu）及其出版的杂志等渠道传播有关南非外交政策的信息。虽然这些举措在现阶段还没有覆盖到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但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南非向国内公众传播外交政策相关信息的重要一步。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非政府逐渐放开对外部事务的传播工作，那么这些举措是有可能扩展覆盖到国际发展相关事务的。

虽然南非议会偶尔会就国际发展相关事务进行辩论，并且国际发展问题在中非合作论坛等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中会被提及，但南非媒体很少关注国际发展。在南非，任何一类国际问题都鲜有报道，其国内媒体更是甚少报道发展合作方面的新闻。引用南非相关人士

87. 2016年6月与南非智库专家（1）的访谈。参考了斯坦陵布什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和分析见 van der Westhuizen, Janice 和 Karen Smith (2015年) 所著“实用国际主义：南非的在世界的角色民意调查”（Pragmatic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on South Africa's role in the world），当代非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3期。

88. 2016年6月与驻南非的非洲学者的访谈；在2016年6月至7月期间与南非本地人的交谈。

89. 2016年6月与南非智库专家（1）的访谈。

90. 南非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信息汇总项目由 Neissan Alessandro Besharati 和 Carmel Rawhani 领导，最终数名研究人员花费了12个月的时间完成。《南非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评估南南伙伴关系的和平、治理和发展》（South Africa and the DRC: Evaluating a South-South Partnership for Peac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详情参见：<http://www.saiia.org.za/occasional-papers/south-africa-and-the-drc-evaluating-a-south-south-partnership-for-peace-governance-and-development>，于2016年8月14日访问。

91. 2016年6月与驻南非的学者的访谈。

的话来说，“南非国内问题已经足以用来卖报纸了”。<sup>92</sup> 目前有限的关于南非发展合作的相关媒体报道总体上来说措辞平衡的，既赞扬南非的努力，提到对南非外交的潜在益处，同时也提出是否可以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提高发展合作有效性等问题。<sup>93</sup> 有些报道则非常具有批判性，重点关注发展援助中的腐败和欺诈行为。<sup>94</sup>

除了正式政府传播渠道外，一些南非智库通过举办公共活动等方式来试图弥补南非公众在发展合作认识上的缺口。虽然这些举措并不属于政府策略的一部分，而且国内受众有限，但它们确实向公众分享了关于南非发展援助的最新研究成果。

92. 2016年6月与驻南非的非洲学者的访谈。

93. 例如：<http://mg.co.za/article/2013-11-29-00-sas-role-on-the-african-continent> 以及 <http://www.bdlive.co.za/national/2013/08/21/warnings-as-big-brother-sa-eyes-the-aid-business>。

94. 例如 Mataboge (2013年)，“高级官员杰里·马特吉拉渡过‘欺诈’风暴”(Top official Jerry Matjila rides out ‘fraud’ storm)，《邮卫报》，2013年10月4日。于2016年11月10日访问。

# 韩国

## 要点概括

- ▶ 韩国公众对韩国对外援助的认识和支持率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提高，而且公众认识水平与支持率呈正相关关系。
- ▶ 引起韩国公众共鸣的主旨讯息有以下四个：第一，全球和平与稳定；第二，道德责任；第三，为韩国带来的益处；第四，因过去得到过援助而“回馈”国际社会也是韩国公众支持发展合作的强有力的理由。
- ▶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向公众传播发展合作，以此建立和维持公众对政府援外方案的支持。韩国国际合作局（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与韩国进出口银行（Korean Eximbank）共同负责传播工作。
- ▶ 韩国国际合作局在发展教育领域的工作有两大支柱：一是国际发展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cademy），另外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项目。合作局还制作相关电视节目，并利用其网站公开相关信息，重点讲述韩国援外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变化。韩国进出口银行则倾向于围绕援外能给韩国带来什么益处这一主题进行传播。

## 发展合作概况

韩国从受援国变为发展合作提供方是相对近期的一个转变。韩国于 2009 年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当时承诺将其国民总收入的 0.25%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但尚未实现这一目标。韩国 2015 年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为 0.13%。一些人认为，援助规模不达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设计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发展项目非常困难。<sup>95</sup> 因此，这一目标被修改为在 2020 年前达到 0.2%。韩国的援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韩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提供无偿援助；另一种是由韩国企划财政部下属的韩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Korea）提供优惠贷款。另外，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起着协调作用。

## 传播背景

在 2000 年代中期，随着韩国海外发展支出明显增加，韩国政府开始担心如何保证公众对增加援款的支持。政府为了更好地了解关于援助开支和国家利益的民意，进行了数次问卷调查（Kwon and Sukyung, 2012 年）。韩国现在假定的事实是，如果精心设计相关活动，

95. 2016 年 7 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提高国内公众的认识，就可以提高公众对发展援助的支持。这也得到了问卷调查结果的支持。问卷调查发现，韩国公众的对韩国发展合作的认识水平和支持程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won 等，2012 年）。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公众对韩国援外的认识和支持程度都有所提高，而且支持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认识水平的提高。研究显示，在 2012 年，只有一半左右的韩国人知道政府的海外援助，但约 90% 的人表示支持。在过去的十年中，韩国公众的认识程度和支持率分别从 37% 和 70% 左右得到显著增长（Kwon 等，2012 年）。其他调查结果显示，20 多岁的韩国年轻人对韩国援外的认识程度最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认识程度会更高（Kwon 等，2012 年）。那些亲自去过发展中国家的人对韩国海外援助的支持程度也会更高（Kwon 等，2012 年）。

在韩国，四个主旨讯息尤其会引起韩国公众的共鸣。首先，韩国是一个负责任、成熟并按照国际价值观行事的全球参与者，这在韩国提供援助的动机排名中名列前茅。<sup>96</sup> 在 2011 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28.2% 的受访者认为“全球和平与稳定”是韩国提供援助的首要原因。其次，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在韩国公众中也是强有力的动机。包括学生在内的许多韩国人会向大型国际非政府发展组织捐款，而且韩国的海外志愿者服务也有着悠久的历史。<sup>97</sup> 在 2011 年的调查中，“作为全球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支持援助的可能动机中名列第二（25.2%）（Kwon 等，2012 年）。第三，为韩国带来的利益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20.1% 的受访者认为援助对韩国的经济和自我利益很重要（Kwon 等，2012 年）。此外，韩国过去接受过援助，现在要向国际社会“回馈”，这种观念也颇具说服力。<sup>98</sup> 2011 年的调查显示，“韩国过去接受过援助”是韩国公众支持韩国援外的第四大动机（Kwon 等，2012 年）。韩国在向朝鲜战争中支援过韩国的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等国提供援助时，这个主题就特别能引起公众的共鸣。这些动机因年龄和教育程度而异。例如，60 岁以上的接受过别国援助的受访者倾向于把“回馈”作为一个重要动机，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则认为全球道德责任是最重要的（Kwon 等，2012 年）。

据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韩国人都支持韩国的援外工作，但是他们对增加援外规模持谨慎态度，研究认为这与韩国公众对国家经济的担忧有关（Kwon 等，2012 年）。在韩国，关于海外支出成效的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论。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20% 的韩国人认为根本不应该有援外支出（Ipsos Public Affairs polling, 2015 年）。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这种谨慎的态度也可能与韩国公众对韩国实际的援外支出金额存在误解有关（Ipsos Public Affairs polling, 2015 年）。

96. 2016 年 7 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Kwon 等（2012 年），同上，第 68 页。

97. 2016 年 7 月 14 日与韩国学者的访谈。调查证据显示，积极参与捐赠或志愿服务的韩国人约占 23%（Kwon 等，（2012 年）同上，第 65 页）。

98. 这一信息几次出现在与韩国学者和总部设在首尔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中。

## 传播实践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向韩国公众传播对外援助，以此建立和维持公众对政府援外方案的支持。传播工作由韩国国际合作局和进出口银行分别负责，这两个机构都在积极地传播韩国的援外讯息。<sup>99</sup>

韩国国际合作局秉承“与韩国国际合作局一道实现全民幸福”（“Happiness for All, with Global KOICA”）的使命宣言，着重宣传韩国援外对全球减贫的积极影响。<sup>100</sup> 传播的讯息往往是偏煽情的，并不是详细说明韩国在海外花了多少钱，<sup>101</sup> 但详细的支出信息可以在部门年报中或通过经合组织找到。

国际合作局在发展教育领域的工作有两大支柱：一是国际发展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cademy），另外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项目，两者都成立于2010年。国际发展教育学院的发起是为了“提供有组织的、政府支持的发展教育”，并遵循爱尔兰发展教育和社会组织部（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Department）和英国国际发展部教育与伙伴关系团队（Education and Partnership Team）的运行模式。<sup>102</sup> 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面向大众的关于发展合作和韩国援外的常规课程、为大学生开设的发展认识项目、以及针对公司和组织的定制课程。学院也为中小學生提供短期讲座，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培训，并面向公众每年举办一场知识分享讲座。<sup>103</sup> “地球村”是一个互动场所，家庭和团体等都可以来“地球村”了解全球性问题，以及韩国是如何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减贫的。<sup>104</sup> 据“地球村”网站介绍，“地球村”承袭了爱尔兰援助志愿服务和信息中心（Aid Volunteering and Information Centre）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全球广场”（Global Plaza）的理念，举办具有国家特色的展览，开展一系列的互动活动和教育活动。<sup>105</sup>

韩国国际合作局也在利用媒体开展传播工作。例如，2011至2014年期间，合作局制作了一档名为《韩国国际合作局之梦》（KOICA's Dream）的电视节目，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国际合作局的工作和精神”，鼓励韩国人参与海外志愿者工作。<sup>106</sup> 为了吸引更多关注，该节目邀请了韩国著名艺人每年跟随韩国志愿者到不同的国家做志愿服务。例如，在2013年的时候，包括“九十年代偶像”在内的队伍被派往菲律宾；还有的队伍去了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sup>107</sup> 这样的节目旨在向公众交代纳税人税款的去向，而且一般来说都

99. 有人认为韩国国际合作局和进出口银行在公众支持上存在竞争，都希望被公众看作为韩国主要援助机构。2016年7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100. 2016年7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101. 2016年7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102.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103.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104.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3.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3.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105.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405/eng/sub1_2.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106.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3-e\\_november/sub2.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3-e_november/sub2.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107. 详情见：[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3-e\\_november/sub2.php](http://www.koica.go.kr/WEBZINE/2013-e_november/sub2.php)，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很受欢迎。除了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之外，合作局还有一个公开的网站，其中包括发展合作政策和策略、道德规范、项目开展渠道、项目规模和组织结构等相关信息。合作局还设有专门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开展一系列提高认识的活动。

韩国进出口银行则倾向于围绕援外能给韩国带来什么益处这一主题进行传播。<sup>108</sup> 进出口银行在网上提供了大量关于其活动的信息，有多种语言可选。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发展合作基金（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成立于1987年，利用韩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促进韩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该基金聘请了两位“大使”来提高公众对基金工作的认识，目前这两位分别为棒球明星朴赞浩先生和体操运动员杨鹤善先生。<sup>109</sup>

108. 2016年7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109. 详情见：<https://www.edcfkorea.go.kr/site/homepage/menu/viewMenu?menuid=005004001003002>，于2016年7月14日访问。

# 土耳其

## 要点概括

- ▶ 总体来说，土耳其公众对本国的发展合作了解甚少，也缺乏关注。但公众的兴趣似乎在逐渐增加，这可能与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的救援支出宣传到位有关。
- ▶ 土耳其公众支持发展合作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为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第二，为了穆斯林国家团结，保护穆斯林人口；第三，受地缘政治的影响；第四，为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对土耳其来说，道德义务不如意识形态或物质因素重要。
- ▶ 土耳其政府缺乏发展合作的对内传播主要是由于：第一，土耳其公众对此关注度不高，认识水平较低；第二，援助支出和数据收集都很分散；第三，政府缺乏政治意愿。
- ▶ 土耳其政府每年发布《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年度报告》和《土耳其发展援助报告》两份报告，报告提供了有关土耳其发展项目的相关情况和统计数据。

## 发展合作概况

土耳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提供援助，但金额很小（Tol，2015 年）。自 2002 年以来，援助规模大幅增加。2015 年，土耳其援助金额达到 33 亿美元，占政府预算总额的 1.56%。大部分用于援助中东（2015 年达到 26 亿美元，包括援助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sup>110</sup>），其次是非洲（4.13 亿美元，特别是索马里），南亚和中亚（3.94 亿美元，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地区（2.07 亿美元，特别是阿尔巴尼亚）。<sup>111</sup> 土耳其 86.9% 的援助用于社会公共设施和服务项目，其中包括教育项目、行政和民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用水和卫生项目等。其次是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10.1%）、生产部门（2.6%）和多部门或跨部门项目（0.5%）。<sup>112</sup> 到目前为止，土耳其还没有发布任何阐明其国际发展总体政策的政策文件。像许多其他发展合作提供方一样，土耳其的发展合作不是通过一个总管机构进行统筹管理的，而是分散在一系列机构中。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成立于 1992 年，目前负责土耳其 10-12% 的发展援助项目。<sup>113</sup> 协调局的作用更多的是实地提供技术合作和协调工作，而并不参与策略制定。

110. 截至 2016 年 3 月 10 日，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人数为 2,733,784 人。这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土耳其的援助总额中。2016 年 11 月 9 日与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官员的书面信函。

111. 2016 年 11 月 9 日和 11 月 12 日与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官员的书面信函。

112. 2016 年 11 月 9 日与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官员的书面信函。

113. 2016 年 6 月与伊斯坦布尔国际非政府组织官员的访谈。

## 传播背景

一些人认为，总的来说，土耳其公众对土耳其的发展援助既不了解，也缺乏特别的关注。<sup>114</sup> 和其他国家一样，很多土耳其民众高估了政府在援助上的支出（Ipsos Public Affairs polling, 2015年）。一些当地专家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许多土耳其人会觉得有很多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他国的发展问题并不应该得到土耳其的高度关注。<sup>115</sup>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土耳其人并没有强烈地认为，应该把钱花在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在其他国家上。<sup>116</sup> 有人认为，如果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公众将会积极回应。<sup>117</sup> 有限的研究表明，土耳其大部分公众认为国家应该提供发展合作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符合土耳其作为前奥斯曼大国的国际地位；第二，为了穆斯林国家间的团结，保护被世界其他地区侵害和边缘化的穆斯林人口（如缅甸）；第三，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第四，为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同样引起公众共鸣的还有土耳其与其所在地区其他突厥民族建立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以及政府所宣称的“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sup>118</sup> 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土耳其人认为道德要求不如意识形态或物质因素重要，但在明确土耳其提供援助的原因上，道德要素仍然起着重要作用。<sup>119</sup> Ipsos 民意调查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援外开支对国内经济有利”，71%的受访者认为“援外支出能提高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Tol, 2015年）。这与土耳其政府保持强劲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优先事项是一致的（Lepeska, 2014年）。

虽然土耳其的发展合作目前似乎为土耳其公众所普遍接受，但随着公众关注度的缓慢提升——可能与叙利亚难民的救援支出宣传到位有关——关于支出去向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公众的不满。<sup>120</sup> 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土耳其的发展合作应该主要用于推动有效的、可持续的发展上，而非开展短期的、小规模、孤立的项目（Tol, 2015年）。土耳其公众普遍认为援外支出对土耳其经济有好处，这可能意味着，如果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率也可能会下滑。

## 传播实践

有人认为，虽然目前土耳其政府的发展合作支出正在增加，但并没有将对内传播放在优先地位。<sup>121</sup> 尽管一些高级别讲话中会提及土耳其援助的某些方面，但这些往往只是讲话信息的一小部分，且发言主要侧重于人道主义援助或文化遗产保护。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也会被提及，常常伴随着“欧洲未能履行其职责”等言论。<sup>122</sup> 然而，媒体很少深入追踪报道这些信息。<sup>123</sup>

114. 2016年6月与伊斯坦布尔国际非政府组织官员的访谈；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115. 2016年6月与土耳其学者的访谈；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116. 2016年6月与土耳其学者的访谈。

117. 2016年6月与伊斯坦布尔国际非政府组织官员的访谈；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118. 2016年6月与土耳其学者的访谈；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119. 来自土耳其学者的书面评论认为，实际上，道德规范对于公众来说比经济因素更重要。

120. 来自土耳其学者的书面评论。

121. 这是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官员、土耳其学者和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中表达的观点。

122. 2016年6月与土耳其学者的访谈。

123. 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与其他南南合作提供方相似，土耳其缺乏发展合作的对内传播似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公众的关注度和认识水平较低（尽管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sup>124</sup>）；援助支出和数据收集分散；以及政府缺乏政治意愿。但是与其他一些南南合作提供方不同的是，有些人认为，如果土耳其向其公众提供更多的援外信息，可能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尽管传播工作看似不足，土耳其官员强调，向国内公众进行传播对土耳其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指出，政府非常重视通过政府报告、电视节目、文章、新闻、社交媒体等途径向公众传播土耳其的海外发展援助。<sup>125</sup> 土耳其外交部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合作作为“集体和共同的责任”、“道德和伦理的要求”、以及“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关键”。<sup>126</sup> 政府每年发布《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年度报告》（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Annual Report）和《土耳其发展援助报告》（Turkey'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eport）两份报告，报告中提供了有关土耳其国际发展项目的统计数据和相关情况。由于土耳其定期向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提供其援外信息，发展援助委员会网站上也可以找到更多最新的土耳其援外数据。此外，协调局有公开网站，提供其援助活动的相关信息，并制作出版讲述成功案例的宣传册。<sup>127</sup> 协调局在其传播的讯息里体现的价值理念为：“帮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支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保护邻国有共同重要意义的历史名胜”。<sup>128</sup> 在最新的一份《发展援助报告》中，土耳其副总理指出了土耳其发展合作在帮助本国“发挥区域力量和扩大全球影响力”上发挥的重要作用（TIKA，2013年）。

124. 2016年6月与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访谈。

125. 2016年7月和11月12日与现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官员的书面信函。

126. 土耳其外交部（英文网站）土耳其发展合作：整体特点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看法（Turkey'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 Aspect），[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于2016年5月25日访问。

127. 2016年6月与伊斯坦布尔国际非政府组织官员的访谈。

128. 2016年7月与现土耳其政府官员的书面信函。

# 英国

## 要点概括

- ▶ 英国定期开展民意调查，了解公众对援外和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民调结果显示，英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认识有限。自 2007 年前后以来，英国公众对英国发展合作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研究表明，英国公众支持援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道德考虑。其他重要的原因包括历史联系和自我利益。不支持援外的理由主要是对援助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以及对国内问题的关切。
- ▶ 目前，英国的传播工作主要侧重于发展报告，而没有更广泛地开展发展教育。传播的内容从道德义务和自我利益角度阐述英国援外的意义，并向公民确保政府在高效地运用公共资金。
- ▶ 英国通过发布相关报告和统计数据，以及使用发展追踪器（Development Tracker）、英国援助匹配计划（UK Aid Match scheme）等多种工具来传播发展合作。政府还为国内媒体创造报道发展合作的机会。英国根据相关研究中关于公众态度和民意的研究成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传播方式，针对最相关，最能产生“乘数效应”的群体。
- ▶ 英国国际发展部通信司的信息与社会组织部门负责开展新闻和传播工作，并推广发展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为发展教育提供小额赠款的责任下放给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或专注发展教育的社会组织。

## 发展合作概况

英国国际发展部成立于 1997 年。从援助规模来看，英国仅次于美国。尽管经济紧缩，但英国在 2013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首次达到国民总收入 0.7% 的目标。<sup>129</sup> 随着英国的援助预算持续增加，政府更加注重对援款的有效利用。自 2010 年以来，英国已经取消了在 16 个国家的双边援助方案，现在主要关注 28 个国家，<sup>130</sup> 前五位为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叙利亚。<sup>131</sup> 2015 年 11 月公布的新援助策略文件明确表达了英国提供援助的动机，即履行道德义务和支持英国国家利益。文件指出，英国发展合作支出旨在达到四个战略目标：第一，加强全球和平、安全与治理；第二，加强抵御危机的韧性和应对能力；第三，促进全球繁荣发展；第四，解决极端贫困问题，为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提供帮助。<sup>132</sup>

129. 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金在 2015-2016 年之前是“受限的”。至少在目前看来，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7% 的承诺很可能保持不变。

130. 详情见：<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bout>，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131. 详情见：<https://devtracker.dfid.gov.uk/>，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132. 详情见：[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78834/ODA\\_strategy\\_final\\_web\\_0905.pdf](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78834/ODA_strategy_final_web_0905.pdf)，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 传播背景

为了更好地了解英国公众对援助和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英国国际发展部定期开展民意调查。民调结果表明，与许多其他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一样，英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认识有限（OECD DAC，2014年）。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公众态度追踪调查多年结果一致显示，40%至50%的受访者表示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计问题了解甚少（Henson等，2010年）。

民调结果显示，英国民众自2007年前后以来，支持政府为减少发展中国家贫困而开展更多政府活动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这可能与2007到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有关（Henson等，2010年）。欧盟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2005年的调查发现，英国是欧洲范围内拥有公众支持援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EuroBarometer，2005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5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增加发展合作活动，但这一比例到2010年下降到了35%（TNS UK，2010年）。和其他国家情况一样，我们对英国公众是如何看待发展合作的并不明确了解；对公众态度是如何形成的更是认识甚少（Henson等，2010年）。一些研究表明，英国公众支持援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道德因素。例如，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英国人感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是出于道德和责任要求（Henson等，2010年）。英国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定性研究也表明，英国公众认为，由于道德原因和历史联系（主要指殖民历史），工业化国家政府肩负着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的首要责任。同时，自我利益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Henson等，2010年）。

不支持援助的人群往往对援助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们倾向于认为，几十年的努力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并且担心资金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府（Henson等，2010年）。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许多人也认为，把钱花在其他国家不如花在处理国内贫困和失业等问题上（Henson等，2010年）。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英国公众往往高估了政府提供的援助金额。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公众对政府援助预算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估计值为18.5%，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只有1.0%（Henson等，2010年）。2010年英国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英国公众希望政府能够更好地传播援外项目（Henson等，2010年）。然而，由于大部分公众对援外的支持是基于他们对援外金额、去向以及提供方式的错误认识，因此，加强公众的认识可能会影响公众支持援外的程度（Henson等，2010年）。

## 传播实践

英国政府通过预算文件和年度报告公开援外信息，在信息的报告上历来透明。然而，在1997年以前，英国都没有官方资助过更广泛的发展教育，相关工作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主导。1997年，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明确承诺要提高公众的发展认知。从那以后，发布了数份策略文件和政策评估文件，重点关注如何以最好的传播方式来建立公众对英国援外的支持。例如，1999年发布的《建立对发展的支持》（“Building Support for Development”）策略文件重点阐述了发展教育能如何改变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并加强公众对援助的支持。虽然制定该策略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它并没有具体说明要如何实现这些长期目标。然而，

国际发展部在 2010 年 5 月宣布冻结一批提高发展认识的项目，这向公众传达了令人疑惑的信号。<sup>133</sup> 2011 年，国际发展部发布了一项策略，承诺公开所有发展合作项目的详细信息（OECD DAC，2014 年）。国际发展部 2013 年发布的《传播能力审查报告》（2013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Review）将传播确定为机构优先事项（OECD DAC，2014 年）。

当前英国发展合作的传播工作主要集中在报道英国相关政策和项目上，而不是开展更广泛的发展教育。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能直接切中公众对发展合作所关切的问题，加强公众参与就能够加强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英国通过传播工作来向公众解释英国是出于道德义务和自我利益而开展援外活动的，并向公众确保政府是在高效地利用公共资金，达到其传播的目标，即“表明英国政府的支持能够拯救生命，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有机会永远摆脱赤贫；提高认识，让英国公众认识到发展能够为英国人民和企业创造一个更安全、稳定、繁荣的世界；表明英国政府正在为取得成果和进展而有效且高效地投入”（OECD DAC，2014 年）。

为了实现其传播目标，英国政府开发了一系列公共传播工具。例如，“发展追踪器”（Development Tracker）是一个公开网站，公众可以在上面快速了解英国实施援助的地点、工作内容和相应成果。<sup>134</sup> 另一个工具为“英国援助匹配计划”（UK Aid Match scheme），该计划将公众捐款与慈善减贫项目进行匹配，旨在“让公众自由表达对国际发展预算支出去向的看法”。<sup>135</sup> 此外，英国国际发展部网站上的相关报告和统计资料也是公开的，并且很容易获取相关信息。<sup>136</sup>

为了提高传播的影响力，英国根据相关调查和研究结果，了解公众态度和民意，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传播方式（OECD DAC，2014 年）。国际发展部 1999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超越本身就支持发展的群体而去开发新受众是存在诸多挑战的（DFID，1999 年）。国际发展部选择在起初的传播工作中重点针对四个主要的互补受众群体，包括正规教育部门、媒体、工商会以及宗教团体，因为它们在影响公众对发展问题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DFID，1999 年）。该策略指出，通过民调结果可以确定最能发挥“乘数效应”的受众群体。自那以来，针对这四个群体的一系列传播项目和资金已得到落实（COI，2011 年），而且国际发展部为落实该传播策略大幅增加了资金投入。截至 2010 年底，总投资金额已达 1.16 亿英镑（COI，2011 年）。国际发展部于 2009 年对该传播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审评，结果表明，该策略在提高公众认识和促进公众参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也指出，由于缺乏评估，难以确定该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COI，2011 年）。

大多数英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认识来自电视和报纸等媒体报道。英国政府长期为媒体创造报道英国海外发展工作的机会。例如，1998 年的时候，一个政府专门小组去到英国各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会面，讨论当前的发展问题。在 2000 年代初期，英国内阁大臣访问了英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相关话题的公开论坛。这两件事都为英国国内媒体提

133. 详情见：<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reeze-on-uk-based-awareness-projects>，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134. 详情见：<http://devtracker.dfid.gov.uk>，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135. 详情见：<https://www.gov.uk/international-development-funding/uk-aid-match>，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136. 详情见：<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供了报道发展问题的良好机会（Czaplinska, 2007 年）。尽管如此，英国公众仍对媒体报道的质量持严重怀疑态度（Henson 等, 2010 年）。在 2000 年代初期，相关研究表明，当时媒体不切实际地描绘援外和发展，例如，他们只是报道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为了促进更全面的报道，政府为记者提供了机会，包括支持他们去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让他们形成自己对贫困问题与发展的理解（Czaplinska, 2007 年）。尽管英国公众对英国缺乏高质量的援外方面的媒体报道感到沮丧和怀疑，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公众在通过国际发展部官网等其他渠道来对媒体报道进行相应补充（Henson 等, 2010 年）。

与荷兰不同，英国并没有将发展教育或提高认识活动与政府政策和项目的报道分开。在机构设置上，国际发展部通信司下属的信息与社会组织部门同时负责开展新闻传播工作，以及促进发展教育和提高认识的活动。一些发达国家将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纳入发展教育的法定或基金资助的相应机构设置中，而英国是通过其国际发展部直接利用一系列符合其总体策略的方案来支持发展教育。为发展教育提供小额赠款的责任下放给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或专注发展教育的社会组织。例如，在英格兰，发展教育协会（Developm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是 1993 年成立的伞式机构，支持和促进英国所有参与提高对国际发展问题认识工作的各方；在北爱尔兰，这项工作由援助和发展机构联盟（Coalition of Aid and Development Agencies）承担；在苏格兰，由苏格兰国际发展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Scotland）负责；在威尔士，由 Cyfanfyd 负责（North-South Centre, 2003 年）。

如前所述，相关研究表明，尽管英国政府在传播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英国公众对英国发展合作的支持程度在下降。国际发展部等机构认识到，现有的传播方式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转变公众对援助的负面看法（Henson 等, 2010 年）。英国发展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定性研究，为英国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相关建议，其中包括：更大程度调动援助伙伴或受援国的参与；把媒体视为发展工作的参与者；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让目标受众参与传播工作；诚实地传播，而不是仅仅报道正面消息等（Henson 等, 2010 年）。



# 结语和五点建议

近年来，一批南南合作提供方已变成重要的国际发展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分析显示，传统发展伙伴的对内传播策略较为完善，而南南合作提供方这方面的实践较为少见。南南合作提供方面临的国内发展挑战决定了他们与传统发展伙伴国家截然不同的传播背景。本研究借鉴了有限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及与政府官员和业界专家等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制定发展合作对内传播决策的背景和现状。

本研究对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进行比较，有以下几点发现：

- ▶ 第一，传统发展伙伴国的公众对其他国家贫困问题和其本国政府发展合作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对南南合作提供方来说，尽管公众对贫困问题并不陌生，但对政府发展合作项目的认识普遍有限。另外，在本研究所涉及的许多国家中，公众往往会高估其政府的发展合作预算（如韩国、土耳其、荷兰和英国）。
- ▶ 第二，不同国家的公众支持对外援助的原因不同。在南南合作提供方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保持团结，提升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互惠互利（特别是经济利益）。这都符合南南合作的一些共同原则。对于本研究中的传统发展伙伴来说，道德义务往往是提供援助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是出于自我利益。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国的公众都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合作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国内的发展挑战和发展合作有效性的问题（如巴西、南非和英国）。
- ▶ 第三，本研究中的所有传统发展伙伴国都具有较为完善的国内传播策略、体制结构和传播工具，并有相关研究成果来支持发展合作传播政策的制定。相比之下，本研究中的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尚无相应基础设施来制定传播政策。
- ▶ 第四，传统发展伙伴的发展传播策略在不同程度上通常包含两个要素：第一，发展教育，即通过发展教育为发展支出搭建宏观背景、提供理由；第二，发展报告，即通过发展报告对支出做出说明。本研究中的大多数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都将传播重点放在发展报告上。
- ▶ 第五，南南合作提供方目前的传播情况存在一些共同问题（如巴西、印度和南非），包括：公众需求水平低；政府对国内公众批评敏感；以及数据一致性和技术能力等问题。这些国家也普遍认为，发展合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不易公开讨论或审议。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了可用于各国政府加强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五大关键点。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态度与他们对发展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Henson 等，2010 年）。本研究从各国的考察结果中得出的关键信息是，**要实现有效的发展合作对内传播，传播方式必须符合各国不同的情况。**根据以上分析，下

文为希望加强发展合作对内传播的国家，例如中国，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并非详尽无遗，但希望能够在该议题上激发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 第一点 明确目标

至少在机构内部，明确传播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传播是为了引发公共辩论，从而提高发展合作的有效性？是为了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巩固政治意愿？是为了将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支出合理化？还是为了加强公众参与，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对传播方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传递的信息没有准确的针对性，加强传播可能就会影响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正因如此，有些国家暂时没有将发展合作传播作为优先工作领域。

*对中国的启示：*

鉴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愈加希望中国能回应世界对中国的期望。然而，尽管中国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指出，中国仍面临着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贫困等诸多国内发展挑战。<sup>137</sup> 所以，尽管加强向国际社会传播，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至关重要，平衡国际期望与国内需求也同等关键。因此，制定一份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 第二点 了解受众

成功的传播重点在于真正吸引受众。要做到这一点，传播者必须了解他们的受众。因此，第二个关键点是：利用定量数据收集（如问卷调查）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深入了解公众的看法、态度以及这些看法和态度的成因。

公众的态度和世界观对他们支持发展合作起到了很大作用。研究发现，就中国而言，民族自豪感是公众支持援外的一个重要动机，甚至比受援国的福祉还重要（Chan and Quek, 2016年）。尽管公众态度很重要，但关于态度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却很少。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其他机构定期开展的公众态度调查确实大体指明了公众对发展合作态度的变化趋势。然而，调查的定量性质意味着调查结果并不能很好地阐明态度的成因（Henson 等，2010年）。因此，可以用更细致的定性信息来补充定量数据，了解公众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中采取的定性方法可能会对这种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有所帮助。

*对中国的启示：*

研究显示，传播的信息越多，公众的支持反而会减少，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管理这种风险的最好方法就是去了解民意和公众态度。为此，中国可以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做法，

137. “十三五”规划中文版见：<http://www.sdpc.gov.cn/gzdt/201603/P020160318576353824805.pdf>。

定期开展民意调查。中国商务部可以牵头，将民调工作委托给相关智库和大学。这样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制定传播策略时提供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 第三点 培养民众的国际精神

尽管目前关于公众广泛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与公众对援外支持之间联系的研究仍然有限，但现有证据表明，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并将世界看作是“公正的”，与对援外的支持程度是有关联的（Henson 等，2010 年）。为了使公众对政府的发展合作政策和项目产生积极的态度，一个必要条件是公众需要拥有与他人超越国界的联结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但这些可以多种形式存在。例如，可以是如英国一样，由于过去殖民关系而产生的道德责任感；或是与土耳其相似，与同族裔人民产生的纽带感；还有像荷兰和英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国际贸易的历史而与世界产生了相互联系的感觉。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有着悠久的民族交流传统。对于韩国来说，履行家庭义务的传统已向外扩展到了更广阔的世界。<sup>138</sup>然而，中国等其他国家重返国际舞台时间不长，因此国内公众往往更关心国内事务。因此，除了对政府相关政策和项目进行报告之外，加强发展教育可能有助于让公众更加理解国家提供发展合作的理由。

#### *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概念。先前的研究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中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援外工作。通过提供更多相关信息，让公众了解中国援外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理由等，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的落实为中国提供了传播机会，可以帮助公众建立国内和国际减贫工作之间的联系。中国可以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触动中国公众，向其讲述中国是如何支持其他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与韩国类似，中国设立了海外志愿者项目，由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商务部负责。志愿者项目始于 2002 年，为讲述中国发展合作的故事积累了大量素材，可以作为中国进一步探索发展合作传播方式的切入点。例如，一个方法是针对海外志愿者项目制作相关电视系列节目，展示中国志愿者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类似于《中国人在非洲》和《龙行天下》系列。韩国国际合作局利用名人效应为《韩国国际合作局之梦》节目提高影响力，吸引更多观众，中国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此外，中国还可以加强发展教育，为学生开设相关学校课程，帮助他们逐渐形成全球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为此，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发展教育项目 - 国际发展教育学院 - 为公众开设课程，也可以借鉴其“地球村”模式，向公众展示中国是如何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消除贫困的。

138. 2016 年 7 月与韩国学者的访谈。

## 第四点 有针对性地传播

第四点是制定符合国情的传播策略。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机构设置需要根据受众的不同来确定。机构的合理设置很重要，因为发展教育、提高认识和发展报告处于发展、教育、经济政策以及外交与安全等众多政策领域的交叉点上（North-South Centre, 2005年）。风险分析和监测评估也应当纳入传播策略的设计阶段。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需要现实地明确可用于开展传播活动的各类资源。为了最有效地吸引目标受众，实现传播的目标，需要对所需的资源类型（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机构支持）以及规模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

### *对中国的启示：*

相关人士认为，中国加强发展合作的对内传播，可以重点强调发展合作的“道义性”、“有效性”、“合规性”、“相关性”和“外交性”五个特征。<sup>139</sup>首先，需要明确向公众传递提供援助的道义性。援外的内涵需要反映中国人重视且易产生共鸣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第二，要以公众可接受的方式展现援助的有效性。中国六十多年来的援外工作积累了很多成功案例，可以向中国公众展示和传播。第三，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都有强烈的兴趣了解中国援外项目的合规性和决策过程。第四，要注意援外工作与普通中国民众生活的相关性。最后一点，援外应该作为中国与他国外交的重要工具。此外，建议中国可以更加明确地向公众传达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及贸易、投资和援外三者之间的联系，即中国的援外不仅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为本国人民带来了益处。

从其他发展伙伴的经验来看，应该针对不同受众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例如，荷兰开发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受众的传播产品。另外，对国际社会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也很重要。中国为此可以借鉴印度发展合作论坛的经验，该论坛作为一个平台，聚集全球发展领域参与者，发挥着向世界传播印度发展合作的作用。

## 第五点 审查和修改

根据一定的成功标准定期评估传播策略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应定期通过比较问卷调查和定性研究的方式审查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态度变化和支持程度。审查结果可以用于进行政策修改和新项目试点。本研究还建议各国灵活地使用多种传播方式，而不只是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方式，并在需要时随时做好调整策略的准备。

### *对中国的启示：*

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经验来看，要保持灵活度，并随时做好准备，对不能奏效的传播方式进行改变。对于中国来说，重点是要试验不同的传播方式，并且使用基于证据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政策调整，试行新举措，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好随时适应和改变的准备。为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相关标准，对传播方式的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并且以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开展定期调查研究，了解公众态度和民意的变化趋势。

139. 2016年6月在北京与相关人士的访谈。

## 参考文献

Almeida, Paula Wojcikiewicz (2013), *From Non-indifference to 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 Brazil's Diplomacy and the Search for Global Norms*,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No. 138.

Arda, Mehmet and Julide Oğuz (2013),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Emerging Powers: The case of Turkey*, unpublished paper.

Author unknown (2016), From recipient to donor, Tharoor lauds India's role, *The Hindu*, 29 September 2016.

Besharati, Neissan Alessandro (2013), *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gency (SADPA): Strategic Aid or Development Packages for Africa?*,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conomic Diplomacy Programme, Research Report 12.

Besharati, Neissan Alessandro and Carmel Rawhani (2016), *South Africa and the DRC: Evaluating a South–South Partnership for Peac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No. 235, available at <http://www.saiia.org.za/occasional-papers/south-africa-and-the-drc-evaluating-a-south-south-partnership-for-peace-governance-and-development>.

Carabain, C., Spitz G. & Hogeling, L. (2012), *Nederlanders en het overheidsbudget voor ontwikkelingssamenwerking*, NCDO: Amsterdam.

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 (2011), *Review of Using Aid Funds in the UK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Global Poverty*, 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 UK.

Chan, Zenobia T., & Quek, Kai (2016), *Rhetoric,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Kindness: A National Experiment in China*. Paper for the 57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in Atlanta, Georgia on March 19, 2016.

Chaturvedi, Sachin (2012), Aid from India, coming to a country near you, *The Hindu*, 05 September 2012, <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aid-from-india-coming-to-a-country-near-you/article3859607.ece>.

Chaturvedi, Sachin (2016), *The Development Compact: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RIS Discussion Paper #203, available at <http://www.ris.org.in/sites/default/files/pdf/DP203%20Dr%20Sachin%20Chaturvedi.pdf>.

Chaturvedi, Sachin and Anthea Mulakala, eds. (2016), *India'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outled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Cheng, Zhiming., & Smyth, Russell (2015), Why Give it Away When You Need it Yourself? Understanding Public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2(1), 53-71.

Czaplinska, Agata (2007), *Building Public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stituto Complutense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available at <https://www.ucm.es/data/cont/docs/430-2013-10-27-PP%2002-07.pdf>.

DFID (1999), *Building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Paper.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EuroBarometer (2005), *Attitudes towards Development Aid*, Special EuroBarometer 222,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Ghemawat, P. & Altman, S. (2012), *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2012*, Bonn: Deutsche Post DHL.

Henson, Spencer; Johanna Lindstrom and Lawrence Haddad (2010), *Public 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for Aid in the UK: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Enquiry*, report fo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Henson, Spencer and Joanna Lindstrom (2013), A Mile Wide and an Inch Deep? Understanding Public Support for Aid: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World Development* 42, 67-75.

Ind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4), *2014 Annu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

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IPEA) (2010), *Brazilian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0*, 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InterMedia (2012), *Building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InterMedia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Ipsos Public Affairs polling (2015), *Global Poll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inding 1, <http://www.ipsos-na.com/download/pr.aspx?id=14882> See also: <http://www.ipsos-na.com/news-polls/pressrelease.aspx?id=6983>.

Kwon, Yul and Park Sukyung (2012), *Korean Public Opinion about Development Aid*,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 p 66. <http://keia.org/publication/korean-public-opinion-about-development-aid>.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Regulation of Foreign Aid: South Africa*, <https://www.loc.gov/law/help/foreign-aid/southafrica.php> accessed 18 May 2016.

Leite, Iara Costa, Bianca Suyama, Laura Trajber Waisbach and Melissa Pomeroy, with Jennifer Constantive, Lizbeth Navas-Aleman, Alex Shankland and Musab Younis (2014), *Brazil's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Rising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Report No. 59*.

Lepeska, David (2014), Turkey's rise from aid recipient to mega-donor, *Al Jazeera America*, April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4/4/turkey-internationalaidafricasomaliamiddleeasterdorgan.html>.

Li, Xiaoyun and Xu, Jin (2016), Analysis of Chinese audience's cognition of China's foreign ai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 national random survey (我国公众对援助的意向性认知分析: 基于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 Unpublished research as part of PhD thesis to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ucey, Amanda (2015), *South Afric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Aren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Mataboge. Mmanaledi (2013), Top official Jerry Matjila rides out 'fraud' storm, *Mail and Guardian*, 4 October 2013.

Mawdsley, Emma (2011), *The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ummary Paper 2: Indi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K.

Mawdsley, Emma (2014), Public Perceptions of India'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tner: Domestic responses to rising 'donor' visibi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35(6), 958-979.

McDonnell, Ida, Henri-Bernard Solignac Lecomte and Liam Wegimont (2003),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Glob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form: In Search of a Virtuous Circle*,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22, OECD, Paris.

North-South Centre (2003), *National Structures for the Organisation, Support and Funding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orth-South Centr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Lisbon.

North-South Centre (2005), *Global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North-South Centr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Lisbon.

OECD DAC (2014), *Engaging with the Public: 12 Lessons from DAC Peer Reviews and the Network of DAC Development Communicator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c/peerreviews/12%20Lessons%20Engaging%20with%20the%20public.pdf>.

OECD DAC (2014), (a) *Good Practices i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OECD DAC Development Centre DevCom,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ev/DevCom%20Publication%20Good%20Practices%20in%20Development%20Communication.pdf>.

Paxton, Pamela and Stephen Knack (2012), Individual and Country-Level Factors Affecting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3(2), 171-92.

Prather, Lauren R. (2011),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Aid Support: Do Individuals Think Like States?*,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11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01 April 2011.

Riddell, Roger (2007),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itz, Gabi, Roeland Muskens & Edith van Ewijk (2013), *The Dut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head of the crowd or trailing behind?* NCDO, Amsterdam, available at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2/res/ada15ee2-be97-4d93-ac0f-0b114c27baab>.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2011), *White Paper on China's Foreign Aid*.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2014), *White Paper on China's Foreign Aid*.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2016),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China's Philosophy, Practice and Contribution*.

Tan-Mullins, May (2011), *The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ummary Paper 1: Chin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1.

TIKA (2013), *Turkish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tika.gov.tr/upload/publication/KYR\\_FRAE\\_2013\\_uyg9.pdf](http://www.tika.gov.tr/upload/publication/KYR_FRAE_2013_uyg9.pdf).

TNS UK (201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Development Spring 2010*. TNS Report prepared for COI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NS London.

Tol, Gönül (2015), *The Rise of Turkish Foreign Aid*, Middle East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www.mei.edu/content/article/rise-turkish-foreign-aid>.

Turk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glish website), *Turkey'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 Aspect*, [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

UNDP China (2014),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Comparing DAC and Non-DAC Approaches*, report prepared for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AITEC).

Usher, Kellee (2011), Brazil: Aid from Below,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20(1).

van der Westhuizen, Janice and Karen Smith (2015), Pragmatic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on South Africa's role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33(3), 318-347.

Yanacopolos, Helen (2011), *The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ummary Paper 5: South Africa*. Open University, Milton Keynes, UK,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dfid-research-outputs/the-emerging-powers-and-the-changing-landscape-of-foreign-aid-and-development-cooperation-public-perceptions-of-development-cooperation-summary-paper-5-south-africa>.

#### 网址:

Donor Tracker: [www.donortracker.org](http://www.donortracker.org)

DFI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bout>

DFID DevTracker: <http://devtracker.dfid.gov.uk>

Eat This: <https://www.eatthis.nu/>

KOICA: [www.koica.go.kr](http://www.koica.go.kr)

NCDO: [www.ncdo.nl](http://www.ncdo.nl)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government.nl/ministries/ministry-of-foreign-affairs/contents/organisational-structure/directorates-general>

OneWorld: <http://www.oneworld.nl/>

Pillowfight for Love: <http://www.pillowfightforlove.nl/>

RIS India: <http://www.ris.org.in/>

SamSam: <http://www.samsam.net/>

TIKA: <http://www.tika.gov.tr/en>



## 附录一 2015-2017 年中国做出的主要发展合作承诺

场合	发展合作承诺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	设立 20 亿美元（初始资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到 2030 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增加到 120 亿美元
	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5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建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2015 年南南合作圆桌会	未来五年内，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六个一百”项目，包括：100 个减贫项目，100 个农业合作项目，100 个促贸援助项目，100 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 所医院和诊所，100 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2 万个培训机会和 15 万个奖学金名额，用于来华接受培训和高等教育，并为发展中国家培养 50 万名专业技术人员
	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200 万美元现汇援助
2015 年全球妇女峰会	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 1000 万美元
	实施 100 个“妇幼健康工程”
	实施 100 个“快乐校园工程”，向贫困女童提供就学资助
	邀请 3 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并在当地为发展中国家培训 10 万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2015 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设立为期 10 年、总额 10 亿美元的“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2015 年习主席访美	设立 200 亿元人民币（约合 30 亿美元）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试点 10 个低碳示范区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 100 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

2016 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总额达 3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到 2020 年将对联合国有关发展机构的年度捐款总额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增加 1 亿美元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145 亿美元）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362.8 亿美元）和 1300 亿元（188.7 亿美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
	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87.1 亿美元）援助
	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2.9 亿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
	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支持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安排 2500 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